“小拉兹”陈荣华，湖北公安人，少时跟随父亲“拉兹”在吉庆街从艺，擅长拉手风琴。

陈荣华的父亲陈义明是1991年到吉庆街演出的第一代民间艺人，因常年在吉庆街演唱《拉兹之歌》而走红，与“老通城”“麻雀”“黄瓜”并称吉庆街“四大天王”，“拉兹”成了他的艺名。陈荣华12岁开始跟父亲学拉手风琴时，老“拉兹”许愿，等女儿手风琴拉好了，就带她找老师学钢琴深造，走出吉庆街。遗憾的是，2007年“拉兹”心愿未了，得肝癌离开了人世。为了继承父亲的衣钵，陈荣华自称“小拉兹”，继续在吉庆街从艺。图为2011年9月，陈荣华在为客人演奏手风琴。

很多请陈荣华演奏的顾客是“拉兹”的粉丝，每当客人听着陈荣华投入地演奏“拉兹”生前最喜欢的两支手风琴曲《微笑波尔卡》和《西班牙女郎》时，那一刻吉庆街仿佛突然静了下来，只有悠扬的琴声在耳中回响，怀念之情在心中激荡。

（图/文 周国献）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张川蕾
编　　辑：华　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目 录

城市之根

4　绿松石镶金饰件考古出土和复原故事 / 吕宁晨

扶贫路上

10　脱贫攻坚路上的“拓荒牛” / 刘志耀
14　回乡创办武汉木兰花乡景区记
/ 葛天才（口述）　汪培华　江　珊（整理）

精工匠心

17　一个永不停歇的追梦人 / 朱川峰

山有黉门

22　一鳞半爪说学缘 / 王先霈
27　回忆站讲台的日子 / 王延武

委员天地

34　从大山深处走来 朝城市深处走去 / 田祚雄
40　一个政协委员的战疫故事 / 郑　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330 期）

往事漫忆

44 长江白鲟与我们渐行渐远
/危起伟 张先锋 何舜平（口述） 陈 洁（整理）

史海钩沉

49 活跃一时的江汉关俱乐部 / 李笙清
53 武汉历史上有三个王家巷码头 / 刘宝生

都市史话

56 清末武汉驿站漫谈 / 苏 醒

楚风汉韵

60 略谈老汉口的“杂耍地” / 张 垠

64 征稿启事 / 本刊编辑部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7
（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绿松石镶金饰件考古出土和复原故事

◇ 吕宁晨

2020 年 4 月，武汉解封，我又回到了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暂时还无法对外开放，但是各个岗位的职工早已开始了工作，就像疫情没有来时的样子。4 月 17 日，我跟随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保管陈列部主任韩用祥在展厅内巡视，走到明星文物绿松石镶金饰件前，准备给展柜底部的恒温恒湿设备加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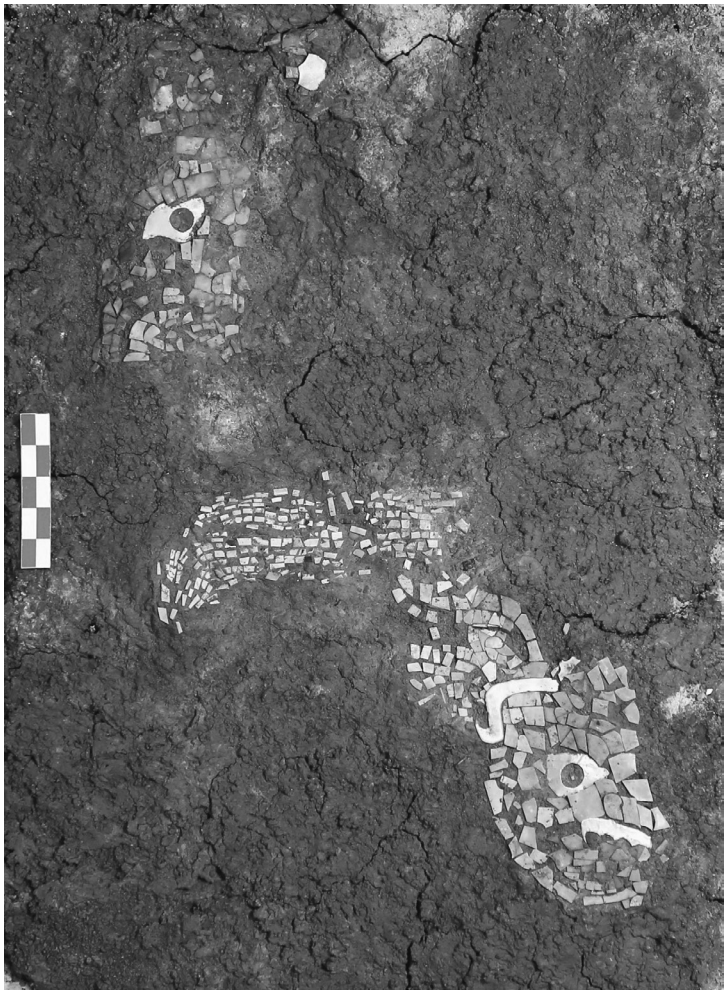
我知道韩主任是当时这件器物的主要发掘者之一，便趁此机会向他询问当时的发掘情况，希望他可以讲一些未在报刊上披露过的发掘轶事。适逢《武汉文史资料》的编辑邀稿，讲述关于绿松石镶金饰件考古出土和复原的故事，院领导安排我对亲历者进行采访并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略抒一二以飨读者。

野外发掘

2013 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武汉大学对盘龙城杨家湾的一处遗址区进行发掘，这处发掘区位于 2008 年刘森淼副院长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西部。在此过程中发现了 7 座分布密集的商代墓葬，编号 PYWM16–22。年末，天气渐渐变凉，南方初冬的寒意已经让人冷得不愿伸出手来。快到元旦的时候，天气不知怎么的，又热了起来，穿一件毛衣都有点闷。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的博士生陈晖依然在忙碌着，这处发掘区的几座墓葬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再把 M17 清理完就可以给这次的发掘画一个句号了。近两个月的发掘，韩主任作为盘龙城遗

址资深的考古工作者，也和陈晖一起注视着这个工地上的一举一动。

M17 是一座盘龙城晚期的商代贵族墓葬。就在 M17 即将发掘到墓葬底部时，在墓葬东壁附近贴近生土层的地方，又有一些小块绿松石出现了。见此情景，一旁的韩主任联想到陈晖之前清理出来的一部分绿松石散块后，提议先不取出，等这片绿松石范围比较清晰之后再说。南方的土水分大，黏黏的，红色的土块粘连着比指甲盖还小的绿松石，稍有不慎便会遗失。整个墓葬的面积并不大，长 2 米左右，宽也只有 1 米多一点，狭小的空间蹲下两个成年人之后就有点逼仄了，更别说还要在不断调整姿势的同时将遗物完整剥离出来了，所以只能两人轮流清理。工地上弯腰低头是常事，更练就了考古人长时间蹲在地上腿不麻的特技。从东壁延伸出的绿松石散块渐渐有了形状，许多细小的绿松石组合起来后，弯弯曲曲的像是一个兽角，又像是一段动物的躯干。耐着性子再清理，发现了一片金片，长条状、细细的、亮亮的，还真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啊！这片金片的形状有点像人的眉毛，一时间，发掘现场的气氛便紧张起来，大伙屏住呼吸继续发掘，离“眉毛”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像眼睛一样的金片。顿时，紧张的空气沸腾了，这个发现真是让人兴奋，没想到在这次发掘的收尾工作中还暗藏着这样的惊喜。绿松石和金子的组合在这之前都没有在盘龙城出现过，包括同时期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都没见过。继续将“眼睛”周围的绿松石清理出来后，情况稍微明朗了些，这应该是一件残缺的绿松石镶金饰件，表现的是一种动物形象。在现场的判断姑且也就这么多，要想进一步判断，还是要完整提取后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才能解开更多的谜团。



室内清理后的绿松石镶金饰件

即使过去了七年，韩主任对这件器物的发掘过程仍旧记忆犹新，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平日镇定的外表也难掩欣喜的内心。展柜里的绿松石镶金饰件是用一个像没有盖子的木盒，将文物和附着的土层固定成长方体的形状后向观众展示的，看到文物全貌的同时，又可以看到当时的出土状态。

“发掘出来以后最难的就是提取了。”韩主任如是说。当时这件文物清理完后，根本没有办法将零散的绿松石和金片单独

拿出来保存，如果单一提取，文物的完整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也会对后期的研究带来不便。发掘现场的条件有限，清理出来的文物在守夜人的陪伴下度过了几个夜晚，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文物提取出来加以保护。鉴于该文物的重要性，张昌平教授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万琳院长商议决定尽快整体提取，即将文物和周围的土壤一起提取。确定好大方向之后，具体的操作又成为一个难题。如此谨慎的工作还是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执行，韩主任便成为不二人选。于是，韩主任全程计划并实施了绿松石镶金饰件的提取过程。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难题，原来这个墓葬的底部并不是完全水平的。尽管两人已经尽可能地将文物揭露出来，但为了防止遗漏，韩主任借助从自行车上卸下来的细钢丝，沿着绿松石所在的位置，小心地将细钢丝当作探铲插入土中，仔细试探下面是否还有遗物。在围绕着文物探过一个扩大范围的矩形区域后，确认再无遗漏。接着韩主任将探测好的矩形范围标记出来，环绕四边挖下一个宽 5 厘米，深 10 多厘米的回字形基槽，基槽自上向下收缩，让文物所在土块成为一个截面为梯形、口大底小的“孤岛”后，将提取范围用绒纸和塑料布覆盖，再用准备好的石膏灌入槽内，等待石膏干燥定型。之所以将基槽做成口大底小的结构，是为了在石膏凝固后提取土方时，底部的土方可以被收缩的石膏固定，防止土方底部由于挤压不足而分散垮塌。经过一天半的等待之后，石膏定型了。将石膏周围的生土拨开后，用石膏做城墙的遗物“孤岛”凸出了地面。眼看提取之路马上到达终点，难题又来了，怎么把石膏“孤岛”剥离出来呢？毕竟墓葬本身还有 1 米左右的深度，用手直接拿下来也不可行，石膏的重量加上土方的重量，谁都不能保证在徒手剥离的过程中文物毫发无损，若是底部的土壤松散了，后果就更严重了，好不容易得来的精美文物变成一片狼藉也就是顷刻间的功夫。思来想去，韩主任打算借助工程用的转向轮辅助提取，在“孤岛”两边远远地固定两个转向轮，用细钢丝做起吊部件，将“孤岛”从上方固定起来，在工人余四元和武大学生的协助下，韩主任用钢丝锯小心翼翼地把石膏“孤岛”和下面的生土分离开来，正当大家屏气凝神地吊起“孤岛”时，突然间被卡住了，可是“孤岛”周围并没有任何障碍物，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韩主任仔细检查后发现，“孤岛”下面有一根树根，生长进了“孤岛”，不偏不倚，刚好长在了正中。见此情景，一旁的张昌平教授便和韩主任一起卧在墓葬中，轻轻地将树根用刀割断，最终成功地收获了这件得来不易的珍宝。这一天正值 2014 年元旦，这件文物也成为盘龙城这一年收到的来自遥远时空最好的新年礼物。鉴于该项发现意义重大，万琳院长立即向相关单位作了汇报，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在万琳院长的陪同下，分管副市长、湖北省文物局局长和副局长先后赶到盘龙城遗址参观了发掘现场，并作出重要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这件珍贵文物。”

室内清理

在文物出土后不久，韩主任和郑远华副院长就把绿松石镶金饰件护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托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文保专家李存信研究员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和科学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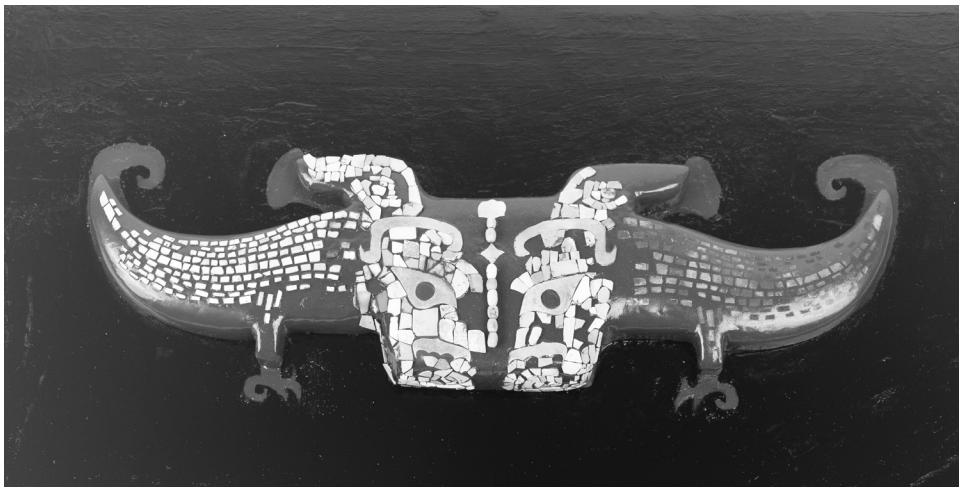
李老师有着数十年的出土遗物保护处置工作经历，曾经在 2004 年出色地完成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出土的大型龙形器清理与仿制复原工作，在绿松石文物制品保护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李老师拿到送去的文物后，并没有着急对绿松石镶金饰件进行清理，而是先做了检查，用机器对文物本体拍摄了 X 光片。通过观看 X 光片，发现土壤下面居然还有金片，覆盖住金片的那一块土壤颜色明显与周围的红色土壤不同，而是呈现青灰色。于是，他根据这一线索，在室内现场针对那一块区域的土壤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清理。在用精巧细致的剔除工具把表层土壤清理后，排列有序的绿松石片和另一只眼睛形状的金片逐渐显露出来。后来，继续扩大清理范围，又在旁边清理出了七八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和一个几何形状的金片。绿松石片和金片都紧紧地贴附在土壤上，饰件的形状没有出现扰乱，看上去像是兽面的轮廓。

清理完后，李老师的团队还绘制了文物现状平面图、拍摄了照片、留取了档案资料。接下来就开始对原来已出现的饰件散乱和扰动的地方进行整理，恢复其原始位置。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便是平整土壤表面，滴入土壤加固剂进行封护，这样可以让土壤表面形成致密土层，确保文物的稳定。最后顺便把提取文物时加固的石膏替换成了更加轻便和安全的木板。通过这次处理，我们也基本掌握了这件器物的基本信息，饰件现有残存大、中、小三块，每一块都是由若干几何形状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和金片组成，身体主要是绿松石片镶嵌，眉毛、眼睛、牙齿、额饰由金片装饰而成。盘龙城出土了这样一件特殊的文物，文物的价值显而易见，当然要让更多的人在第一时间看到它，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克服了闭馆改造期间的重重困难，想尽办法将绿松石镶金饰件推荐到了 2016 年 7~10 月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承办的“青铜的对话：黄河与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上和 2016 年 11 月 ~ 2017 年 5 月在武汉博物馆承办的“南土遗珍——商代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特展”上。

复原研究

博物院新馆基本陈列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展览中浓墨重彩的明星展品，遗址博物院联系了南方科技大学商周考古专家唐际根教授合作开展关于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复原工作，这次与唐教授的联手，是为了在展览过程中将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原本面貌和文化内涵深入浅出地解释给观众。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设有文化遗产实验室，在文化



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原展示

盘龙城杨家湾 17 号墓考古现场

遗产保护理念、数据整理、人工智能结合和文物保护新材料开发等跨学科领域颇具领先优势。唐际根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联合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存信研究员等组成了跨学科型创新研究团队，包括了考古学、文物学、美术学、材料学及工艺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强大的科研力量为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复原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面对文物不尽如人意的保存现状，唐际根教授的科研团队采用各种科技手段获取文物的基础数据资料，如利用绘图软件实现考古电子绘图，把文物构成数据可视化；使用超景深电子显微镜进行文物加工工艺方面的微距观察；与北大深圳医院和东莞国家模具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合作进行专业级 CT 扫描……文物内部的考古信息愈发清晰。种种迹象表明，土壤中可能还有一枚金片。多番研究过后最终决定开挖 1 平方厘米，经过“微考古”发现了 1 枚菱形金片，其位于兽面的眼睛附近，被确认为装饰兽面的眉间饰；对文物外表进行三维扫描，获得文物外部整体的三维模型；在文物数字化基础上进行 3D 人工智能模拟拼合，为文物复原拓展思路。经过 8 个月的细致观察与初步研究，科研团队如福尔摩斯探案般还原了绿松石镶金饰件从室外发掘到室内整理保护的整个过程，掌握了绿松石和黄金的矿物含量与加工工艺，分析出饰件原来的承托载体和胶黏剂。

最后，研究到了最关键也是最精彩的一步——重建文物的原貌。唐际根教授认为重建复原的基础是文物本体残存的现状。绿松石镶金饰件是被打碎下葬在墓葬中的，整件文物破碎分散在墓内多处，其中 6 枚金片的形状包括了眼睛、牙齿、眉毛、眉间饰、额饰，而这些部位是商代兽面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干长条状绿松石组成的身体部位被翻转，对其调整之后可以看出躯干下还保留有腿足的形状。兽面的左上角突出的部分为耳朵，兽面中间有缝隙，不过在墓葬内还发现一竖排的绿松石细管，确定为兽面的鼻翼。鼻翼下方的绿松石片散乱，与其他排列有序的状况不同，显示兽面的面部不平，应为浮雕作品。至此，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原貌已有了初步的轮廓。

2019年春节，唐教授带着109G容量的绿松石镶金饰件实验室数据结果和国内外绿松石兽面相关研究材料的文件夹回到江西老家的大山里，经过一个月的“闭关”复盘研究，认为复原方案在各方面都解释得通后，才最终确定了复原结果。

绿松石镶金饰件的本来面貌是一首双身浮雕龙形饰，通长31厘米、头部高13厘米、宽11厘米，由上千片各式各样的绿松石片和8枚金片组成，五官清晰突出，身体线条紧实，形神兼备，富有张力。饰件以大漆为粘合剂，胶结在木材或皮革等有机质之上。绿色的玉石、金色的黄金和黑色的大漆黏合镶嵌，三色搭配，相互映衬，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形成独特美感。整个饰件结构复杂、材料多样，金片的含金量达70%以上，精湛的工艺水平可见一斑。

复原科研项目验收结项时，与会的专家认为能把严重损坏变形的绿松石镶金饰件成功重建复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复原的结果也令人震撼，毫无疑问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基本陈列展览提供了一件精美的展品。在验收会上，还有一段小插曲，有的专家认为绿松石镶金饰件头部硕大、身体蜿蜒，应该是一件虎的造型，还在会上掀起了一阵“龙虎之争”的讨论。

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绿松石镶金饰件的神秘面纱，通过零星的考古材料如何能够巧妙科学地探究背后的历史真相？绿松石镶金饰件到底是粘在什么样的承托载体上的？它是在什么场所如何被使用的？为什么要被打碎陪葬在墓葬中……

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发现、保护之旅真是一段丰富多彩的故事，观众眼中的“明星”原来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底蕴。我学习到这一段文物的历史，突然间期待有更多的观众可以再次走出家门，来博物院一睹中国最早金玉饰件的风采，来了解盘龙城的前世今生；更期待大家可以在畅游文物世界中感受武汉这座英雄的城，不负古人的智慧与荣耀，不负今天的胜利与春光。

按：2013年盘龙城遗址的发掘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主持，参与发掘的人员有武汉大学研究生孙卓、陈晖、田剑波、王刚、单思伟，本科生庄霞、谢晓庆、刘富强、周燕林、白富元，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韩用祥、余才山。此次发掘报告《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发表在《考古》2017年第3期。

（吕宁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保管陈列部助理馆员）

脱贫攻坚路上的“拓荒牛”

◇ 刘志耀

我叫刘志耀，59岁，是武汉市民政局一名普通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曾当过兵的军人。2009年至今，我先后奋战在武汉农村小康建设、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三万”工作、精准扶贫战场上，始终以帮扶群众脱贫为己任，倾我所有，尽我所能，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带着永不降温的工作激情，踏遍了黄陂区、江夏区29个村，跑出了16万公里的扶贫路，我用足迹丈量与群众的距离，参与帮助1700多户贫困户走出困境，与700多户贫困家庭结成“穷亲戚”。2018年11月，我挂任江夏区舒安街党工委副书记、片区联络员。我先后被表彰为“湖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时代楷模——武汉好人”“武汉市文明市民”“武汉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武汉市最美志愿者”，2019年，我作为武汉市唯一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湖北省级复选对象通报表扬。

但愿苍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我时常说，“扶贫干部要有‘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身’的坚强意志，时刻想着处在贫困境地的群众，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才能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009年，市民政局派我到江夏区舒安街、乌龙泉街等地开展小康帮扶工作。2011年，陪伴我下乡的一辆富康车仅使用了两年，就被我跑垮了，我只好又重新买了一辆二手车当“伙计”。2012年，我转战到黄陂区蔡家榨街负责11个村的帮扶工作，千方百计协调4个社会团体和3家企业，累计筹措帮扶资金达45万元。在帮扶永福寺

村过程中，我倾注满腔真情，致力于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2013 年，由法国专家太太们组成的武汉银杏苑慈善团被我的善举所感动，积极加入了我的扶贫队伍。此后，“法国专家太太慈善团”资助 20 多万元为永福寺村建起茶园和公交车站，并常态化担负起该村 10 个贫困户的救助义务。2015 年 9 月，武汉市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后，我重新回到江夏区舒安街驻村帮扶，任八秀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八秀村地处江夏区最南边，与鄂州、咸宁交界，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农业科技含量低、产业结构单一，是一个集体经济空壳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0 户 86 人。

2018 年 9 月，扶贫干部刘志耀（右）与贫困户蔡正启在田地里

2015 年 11 月 2 日，我进驻该村，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就走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深入每一个贫困户家中掌握情况，摸清底数。“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我结合八秀村实际，设法引进村能人回乡成立精准扶贫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帮助 20 个贫困户参与合作社的生产，让每个贫困户能够拿到 4000 元的月薪；我积极努力争取帮扶单位市民政局的资金支持，筹资了 35 万元，加上市区扶贫资金 50 万元，用以建设 100KWP 光伏发电项目，让村集体每年增收 10 万元，一举打破贫困村集体收入为零的记录；此外，我还带领工作队多方协调，筹措 25 万元新建 30 亩果园，筹措 50 万元为贫困户购买生产资料，筹措 80 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并修建当家塘；还协调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在智力、产业、技术等方面帮扶贫困群众；联系华中农业大学等院校专家，对该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进行指导。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效拓展了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提升了村民的脱贫致富能力。2018 年，八秀村 70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销号，全村摘帽出列。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八秀村被打造成了舒安街首个美丽乡村。2019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76 万元。

扶危济困救寒贫 真情帮扶暖民心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

2012 年 11 月底，我来到黄陂区蔡家榨街雨台山村帮扶，在这里，我遇上了一户特困家庭：户主周桂华患病卧床 10 多年，妻子因为精神问题带着女儿回了娘家，10 岁的儿子周顺利由哥哥照顾，因为是黑户，孩子没有学籍。一贫如洗的周家，窗户四面透

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就连仅有的一张床，都是用砖头垫起的破门板……眼前的情景让我倍感心酸，于是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帮助周家走出困境！之后，我带领村干部经过多方协调，解决了孩子的户口问题，并给办理了学籍，还让周家享受到了低保政策。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被我的真诚和善良所感动，给周家送来了慰问金和物资，帮助周家修缮房屋，添置家具家电……整整11年没有走出家门的周桂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三年后，我虽然已被派往江夏区进行扶贫工作，但周家的贫困始终牵挂着我的心。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我从未终止过对周家的帮扶，长期承担了周顺利的学杂费和学习资料费用，还自费请老师辅导孩子学习。2018年，我帮助周顺利申请了“雨露计划”和教育扶智助学金，周家人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了。周家人是不幸的，因为遭受了人生莫大的苦痛；但周家人又是幸运的，因为我用坚守的善举汇聚起力量，向周家传递着社会的温暖和大爱。“周桂华站起来的希望太渺茫，但他的儿子可以创造未来，如果好好培养，这个家脱贫就有了希望，我决不能让周家的贫穷延续到下一代。”这是2018年《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的一句话。

在江夏区舒安街八秀村开展扶贫工作时，村里有一户贫困户李寿春，他患有癫痫，女儿听力残疾，由于家庭贫困，两个30多岁的儿子都未成家。李寿春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住的房子是民政部门帮助解决的。李寿春吃尽苦头种植了170多亩晚稻，但由于身体原因，收割的10余万斤稻谷销售不出去。我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四处奔波打听，找人帮忙销售，终于在2016年春节前夕，将稻谷成功卖出，解决了李寿春一家等钱过年的燃眉之急。除此之外，我还针对他家的致贫原因，精心制定了帮扶措施，使得李寿春家终于在2016年年底脱了贫，从此，我又多了一个“穷亲戚”。

2020年4月，刘志耀（右）与贫困户李寿春在田地里研究疫情期间的春耕情况

2016年9月1日，我国首部《慈善法》颁布实施。为了发动社会力量帮助更多的贫困户，我用自己的驻村生活补助注册成立了全省首家“‘武汉好人’扶贫帮扶基金”，成为《慈善法》颁布后首个具备募捐资格的个人。我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募集帮扶资金6.8万元，各类物资20余万元。季节更替或者遇上节日的时候，我

给农村福利院老人送去衣服和礼物；组织贫困村15名老人在重阳节“游大武汉·登黄鹤楼”；为3位尿毒症和白血病患者贫困家庭送去了8000元帮扶资金；为舒安小学送去了2000元体育设备，并为该校29名留守儿童送去了羽绒服；2018年六一儿童节，我组织留守儿童参观武汉科技馆，让孩子们亲身感受科技的魅力，此事被中央电视台关注报道。春送农需、夏送清凉、秋送关怀、冬送温暖，近年来，我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近40万元，请求市民政局领导组织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参与扶贫1100余人次，捐赠钱物50余万元。

敢于担当善作为 脱贫攻坚排头兵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员干部是脱贫攻坚的“主心骨”“主力军”，作为见证武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四朝元老”，我在扶贫日记扉页上这样写道——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员干部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我要铭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带领群众向贫困宣战。

为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破除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引导村民树立“明理、感恩、自强”的社会新风尚，2018年，我率先在八秀村建立全市首家精准扶贫“爱心超市”，让贫困户用积分兑换物资，调动了贫困户的内在动力。另外，我还多方协调筹措社会资金65万元，引导帮助全市25个贫困村建立起了“爱心超市”。

2020年年初，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江城，打破了人们对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的美好期盼。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武汉“壮士断腕”，宣布进入全面封城状态，武汉农村的气氛也随之变得异常凝重起来。村庄封村封路，村民无法外出购物，“用积分兑换防疫物资”的帮扶模式派上了大用场，村民们充分感受到了精准扶贫的人文关怀和贴心服务。我还针对贫困户急需的生活用品，用自己创立的“‘武汉好人’扶贫帮扶基金”补充“爱心超市”货物。这种通过“爱心超市”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武汉样本，受到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连续报道。

“戴口罩”“不出门”“消毒”“封村封路”，让本来就陷入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疫情期间，虽然无法进村开展帮扶，但我对贫困群众的爱从来都没有缺失。经过多方协调，我向江夏区舒安街和八秀村捐助若干防疫物资，包括口罩2000个、酒精50公斤、防护服30套、手套200双，以及6万余元的生活物资；向黄陂区蔡家榨街福利院、卫生院募集捐助7万元生活物资和抗疫物资。

鞍马犹未歇，战鼓又催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惟不忘初心者进，惟勇担使命者胜，惟坚韧不拔者强。奋斗是书写历史的最好方式！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已播种了春天的希望，并共同期待秋天丰收的时刻！

（刘志耀：武汉市汉口殡仪馆副馆长，武汉市民政局驻舒安片区联络员，挂职舒安街党工委副书记）

回乡创办武汉木兰花乡景区记

◇ 葛天才（口述） 汪培华 江 珊（整理）

2014 年，我创办了木兰花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直到现在我还担任着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堂片区综合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肩负着杜堂片区经济发展的重任。木兰花乡是我们深度结合民俗文化与自然文化，历时 6 年时间打磨、创办的独具特色的一个武汉乡村旅游景区，这里四季花香、山清水秀、村落美丽，还有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是武汉市民郊游的好去处。目前，木兰花乡景区已经升级为国家 4A 级景区，2019 年接待游客 70 万人，旅游收入 11260 万元。回顾 6 年的奋斗历程，我心潮澎湃，感慨颇多。

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堂村是我的家乡，外出打拼多年之后，我终于在建筑行业有所成就。2009 年，我创建了武汉万中集团，但回报桑梓一直是我一生的愿望。于是在 2010 年的时候，我捐资 100 余万元，为家乡的新农村家园建设修建改造了两口当家塘，两个休闲娱乐广场，硬化了“家家通”路面。2012 年，我回家探亲时看到大多数乡亲选择了外出务工，导致家乡土地大面积抛荒，于是，我成立了武汉争强苗木花卉有限公司。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又投资千余万元，利用村里的花园水库优势，流转周边荒山荒地 1300 亩，水面 300 亩，建设了花卉苗木基地和香樟树基地，吸收了当时留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苗木公司务工。

到 2014 年，虽然村民们在苗木花卉公司打工有一定的收入，但是整个村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善。看到村里有许多房屋破旧闲置，杜堂村还有 35 户是贫困户，相邻的崇杰村还是贫困村，我就暗下决心，要彻底改

变家乡的落后面貌。2014年，我响应政府的号召，毅然回到家乡，投身家乡的美丽乡村建设。当初，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村湾环境的集中改造和农户住房的统一修整，建设美丽乡村，以葛家湾湖泊花溪、乡野村落、花林田院为资源依托，打造“四季花乡”“人文花乡”和“休闲花乡”的乡村特色旅游品牌。现在这个梦想可以说实现了，回想木兰花乡的建设历程，简单地说就是“四步走”。

第一步是把杜堂村建设成美丽乡村。杜堂村面积3.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058亩，水面485亩，共有13个自然湾471户、1748人。我深深地认识到，家乡的山山水水、农耕文化传承和丰富的劳动力是乡村发展可利用的丰富资源，开发利用好这些资源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4年，政府投资2000余万元，我自己又投资了3000万元，完成了5个自然湾257户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屋统一改造，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美丽乡村是后来“杜堂模式”形成的起点。

第二步是投资兴业打造木兰花乡景区。为了让美丽乡村有产业支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上，2014年，我注册成立了木兰花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先期流转了我们村全部土地（含山场、水面），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邻近的崇杰村，使土地流转面积达到7000亩。对流转的这些土地，我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改抛荒地、水稻田、旱地为种植花草苗木，并且植入旅游元素，实行综合经营。

木兰花乡景区总规划面积约7000亩，涵盖了姚家集街道四个行政村（含一个崇杰贫困村），截止到现在总投资约10亿元。2017年3月份正式开园营业，吸引游客160多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8.6万余人次，营业收入达25737万余元，单位面积收入是过去的数十倍。而从产业业态的角度看，不仅农业种植功能得到延续，而且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电子商务、餐饮住宿等新业态也在蓬勃兴起。

第三步是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农民入股分红。2017年4月，武汉市大力推进“三乡工程”（即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我以景区产业为主体，牵头村集体成立了湖北首家旅游专业合作社——武汉杜堂旅游专业合作社，将113户农户闲置的房屋集中起来，通过专业评估，按每平方米1600元的价格入股合作社，再由公司对房屋进行统一设计、整修、管理，统一向城市市民、创业者招商，定向经营农家乐、民宿、文创、商业等业态，农户按入股金额的10%保底分红，上不封顶，使村庄和产业、农民和企业彻底融为一体。2018年2月7日，杜堂旅游专业合作社分红大会在我们湾广场举行，杜堂片区的1088位村民作为受益人共分红520万元，户均年分红2万元左右，加上村民的打工收入、土地流转收益等，直接带动村民户均年均增收6.2万元。

第四步是打造“杜堂模式”，激活农村经济，促进产业振兴。以姚家集街杜堂村为核心，建立吸引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承载平台，并以此为依托，建立完整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条，形成以产业带动农业就业、带动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繁荣的发展体系，打造乡村振兴的“杜堂模式”。

以前我们杜堂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村民们纷纷外出务工，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愿回来。现在有了产业支撑，仅2019年一

年，我们景区就安置就业了1300余人，不仅吸引了一大批长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返回家乡，更吸引了一批大学生管理人才扎根乡村、实现理想。此外，各行各业的优秀市民（如国家级木兰文化非遗传承人叶蔚璋、湖北美院油画系教授贾恒等）也下乡创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杜堂片区的人才架构，带动了农村人才振兴。

良好的生态环境、优惠的投资条件、稳定的产业支撑，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市民下乡投资。杜堂旅游专业合作社签约的房屋中除了12家民宿、8家农家乐、1家土特产电商、1所画社、1所木兰文化博物馆外，如今还吸引到了卓尔控股、天福茗茶等知名企业入驻木兰花乡投资，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大力推动杜堂村“三乡工程”落地的“杜堂模式”已闻名遐迩。杜堂村获得“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武汉十大最美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先后4次在央视等新闻媒体播出专访，接待了各级领导400余次考察指导，同时也得到了各级电视媒体的多次报道。

下一步，我们将对杜堂村、崇杰村、北门村、柏叶村进行整体规划，分步组织实施，利用杜堂村推进“三乡工程”落地的经验，整体打造杜堂社区，形成杜堂发展模式。计划继续投资3亿元，重点以发展休闲康养为核心产业，打造康养基地、农村“双创”基地，切实鼓励、吸引更多市民下乡，从而实现盘活闲置农房、盘活农村经济的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实行四村联动，打造杜堂创业、崇杰康养、北门、柏叶种植加工的杜堂社区产业链。杜堂村是我们的核心景区，我们鼓励市民下乡投资创业，杜堂村相邻的重点贫困村——崇杰村也规划在景区内，目前基础建设和农田整治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将引进市民居住、养老、休闲，真正让市民体验到乡村的田园农家生活。同时为了把北门村、柏叶村建设成为农业种植生产加工区，我计划将小田整合为大田，实现机械化，减少农民劳动强度，完善喷灌设备，保证水源，安装上监控系统，实现智能化生产。还将聘请农业专家对土壤进行有机改良，指导农民种植高产有机农作物（粮食、蔬菜、水果），让农民耕种田地就能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从而真正解决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

回首过去，我觉得自己对家乡所作的贡献还不够，还有很多事情尚在计划当中，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它们变成现实。展望未来，我信心满满，再过五年，木兰花乡将更加完善、美丽、兴旺，一个优美宜居、充满活力、幸福祥和的杜堂社区将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葛天才：木兰花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堂片区综合党委第一书记；汪培华：黄陂区扶贫办信息调研组组长；江珊：木兰花乡景区办公室主任）

一个永不停歇的追梦人

◇ 朱川峰

我叫朱川峰，来自武汉富士康科技集团武汉科技工业园，现在是集团金机虎事业群创新设备研发单位的专案经理。我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中专毕业后进入富士康科技集团，成为一名模具加工技术员，从一线技术员做起，刻苦钻研精密模具加工技术，从事模具加工 16 年，2017 年转型做自动化开发工作，专注模具生产自动化、智能制造等领域。

学而不厌坚持不懈

我从小就有一个大学梦，自幼勤奋学习，1997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在中专二年级时，我参加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自学考试，最终取得了自考大专学历。那时我在富士康工作已经 4 年多了，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有关软件开发的难题，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于是在 2003 年又参加了中山大学的自学考试，一面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工作中，一面通过自学取得中山大学计算机网络专业本科学历。由于工作绩效优异，2014 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选拔，被集团派往勤益科技大学参加第一届商务研习，主攻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最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学成归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到先进的知识，我从部门中挑选了 8 名优秀员工，成立了自动化学习团队，利用业余时间给大家上课。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上课，当我正在全

神贯注地给大家演示画图步骤时，突然一个穿制服的民警同志打断了我们，他严肃地说："一个大爷举报这儿有人搞传销活动。"在听了我们的解释，并且看到笔记本电脑里显示的确实是自动化学习资料后，民警同志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到："小伙子们，为你们这种学习精神点赞！"

苦心锤炼技能及管理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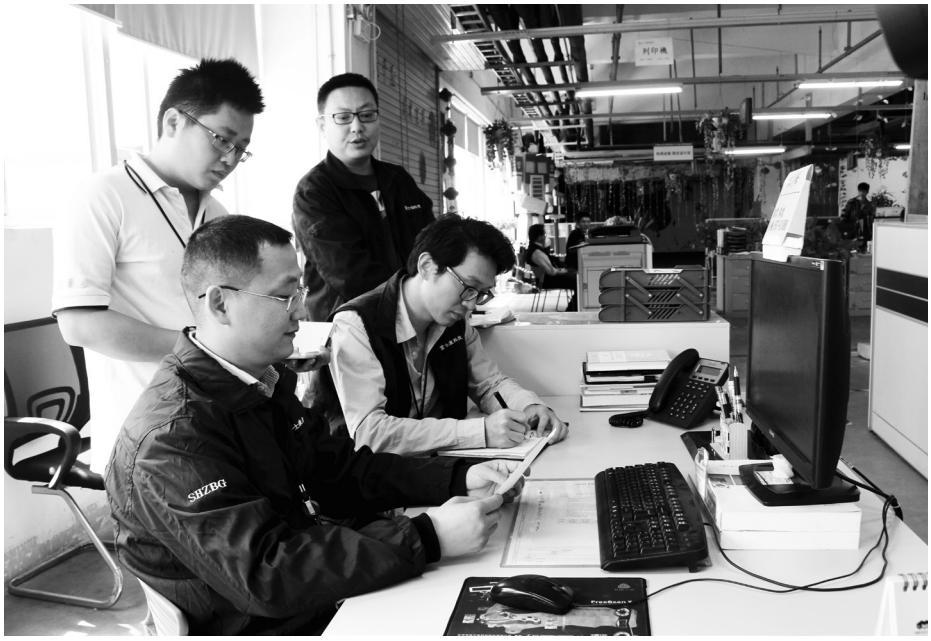
2001 年 3 月，我进入富士康的"黄埔军校"——昆山培训中心。第一次入训考试结束，我的数学考了 90 多分，但机械制图只考了 6 分，因为机械制图与我所学的专业完全不对口。当时我并没有气馁，认为其他学员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于是我坚持每天结训回到宿舍画图 3 个小时，有时候为了不影响宿舍其他学员，我在楼道里趴在凳子上画图。一个月之后，我的机械制图成绩上升到 80 分左右。我一边学习线切割加工技能，一边坚持学习机械制图，半年之后，我的最后结训考试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三，终于收获到付出之后的喜悦。记得那是 7 月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培训生活后，我在楼道里给家里打电话。当时我是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最后一批统招生，国家安排工作，父亲说我去县里工作的派遣证送到家了，让我去武功县经济贸易局上班，我毅然选择了富士康，至今仍然不后悔。

2001 年 8 月 至 2007 年 4 月，我在富士康担任模具加工技术员一职，从事精密冲压模具、塑模、自动机、精密模板线切割加工、细孔放电加工等工作，更加刻苦钻研精密模具加工技术。2007 年 5 月，我走上了管理岗位，担任精密线切割课组长，由于工作绩效优异，2008 年，我被晋升为课长，成为公司当时最年轻的课长。

2010 年 11 月，我被提拔为模具制造部门部级主管，主要负责加工部的运营，包括产出、质量、交期、效率、成本的总体规划，订单承接、协调与管控；精密模具及检治具加工技术精进，工艺研发与指导，核心加工技术传承；模具自动化团队建立，组织学习与深造，公司 NC 自动化工作推动等工作。在此期间，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和铣削加工技术，熟悉模具加工制程工艺。同时，我的组织规划、协调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2013 年，部门从深圳搬迁

2016 年 3 月，朱川峰在检查精密模具品质

至晋城厂区 F04 栋新厂房。2015 年，部门从晋城搬迁至武汉厂区，建设及搬迁、技改等各项工作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2019 年 5 月，朱川峰（左二）和同事们在研讨自动化设计方案

2015 年 5 月，武汉富士康集团承接了重要的越南专案，我的主管负责此项目，后来因主管生病住院，此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时设备和人员都是从各地转调来的，生产非常不顺畅，我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定目标、定负责人、拟定办法、实行 1 小时报告制度，即负责人每 1 小时都要报告各工段的产量及良率；我还亲自到瓶颈工段解决技术难题，到了周末晚上 8 点左右我又自发来到公司紧盯项目进度。一天晚上零点，我接到现场电话，反映放电工段出现质量不良问题，我连忙从家里骑车到公司，协助放电工段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已经是凌晨 2 点多了，我当即决定不回去了，就在公司熬了一夜。在那段日子里，熬通宵是常有的事情。一个月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越南项目顺利结案，这是对我管理能力的一次实战考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真正含义。

创新实践出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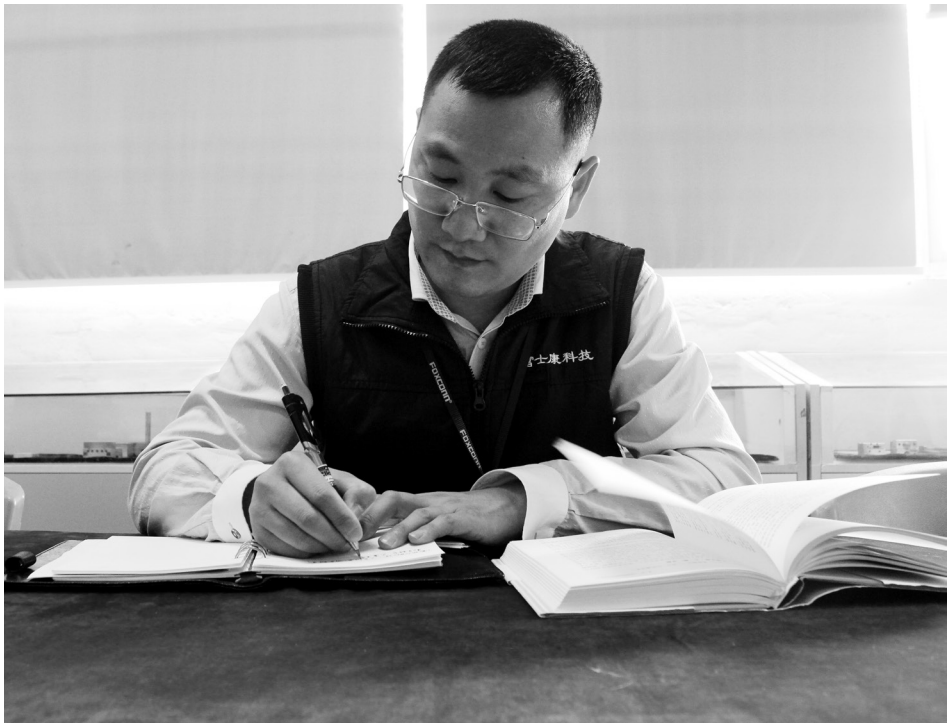
在多年的工作当中，我积累了丰富的模具及检治具制造经验及生产管理技巧，工作积极主动，敢于直面困难，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实绩。

2007 年，我主导内孔研磨工段自动转程软件设计工作。内孔研磨设备的精度非常高，可达到 +/–1 微米，但这种设备的程序是加工者手动输入的，非常浪费时间，当时主管让我主导此项目时，我虽然有点 C 语言编程基础，但这个项目需要对 AUTOCAD 进行二次开发，我觉得无处下手。周边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请教也成为难题，我就上网查数据。了解到 AUTOLISP 二次开发语言结合 EXCEL VBA 语言可以解决此难题，我就自己去书店买了相关书籍，在家里自学，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编程、调试。有时遇到一行代码报错，自己无法解决，因当时懂得 AUTOLISP 的人很少，也没办法请教，我就不断修改代码，往往调试到深夜仍没有结果，只能第二天再去书店查看参考数据，当找到解决办法时我会特别兴奋。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编程，反反复复地修改，三个月后，内孔研磨工段自动转程软件编制完成，大大

地提升了此工段的编程效率，而且质量保证率达到 100%，得到单位主管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当时一个简单的工业软件成功的案例，从此，现学现用、边学边做在我的工作中逐渐涌现出来。

2008 年年底，富士康进入 A 客户时代，制造手机所使用的治具大量投单，慢走丝线切割工段产能严重不足，公司高管们焦急万分，此问题亟待解决。当时作为线切割课长的我也想尽办法，多次尝试之后，加工效率改善仍然不明显，但我并没有气馁，认准工作困难点就是创新的突破口。我心里时刻惦记着这个问题，走路时、吃饭时，甚至睡觉时都在思考。两周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一边盯着线切割机台思考问题，一边用手上下提放线割机水盖，突然间灵感迸发：既然水盖可以活动，是不是可以精准控制它的移动范围呢？结合自己在公司学习的改善手法，我研发出线切割加工可调式水盖装置，线切割加工效率提升了 15%。后来此改善获得了公司高等改善奖，并申请了公司专利。

在从事模具制造的 16 年里，我先后研发出了精密冲压模板加工技术，长度 500 毫米的模板，精密线切割加工所有孔径精度 +/–0.002 毫米，垂直度 0.002 毫米，最远孔间距可自由控制在 0~0.005 毫米以内，弥补了珠三角地区进口日本超精密端子模板的短板；线切割水割镜面加工技术，线切割水割钨钢镜面加工技术，加工工件面粗度达到 Ra0.04，填补异型细小模具零件镜面加工技术空白；线割 V 型定位治具研发技术，研发设计线切割架模定位治具，重复定位精度 +/–0.002 毫米，实现机外架模互换加工；线割批量模具零件高效能机械加工技术，实现大批量异型零件化零为整、无落料等精益生产方式加工突破，为模具行业节约 179 万元；NC 机台互换治具技术，制作气动互换治具，互换加工提升机台架动，为自动化上料机奠定基础，为模具行业节约 107 万元；提升设备架动率 8%；超级镶牙套技术，制作上牙套治具，使半自动攻牙代替手动攻牙。



2019 年 5 月，朱川峰在自学自动化专业知识

这些年，我培育模具人才 685 人，提出高等改善提案 69 份，为模具行业增效 1183 万元，还申请国家专利 10 个、集团专利 6 个，为此多次获得富士康科技集团高等改善

和技委会奖励，以及集团最佳模具零件制造金赏奖、最佳生产技术进步铜赏奖、最佳品质活动推动金赏奖。

敢于担当挑重担

2015 年，武汉富士康科技集团金机虎公司为了扩充产能，从成都移转了 72 台美国哈斯数控加工机。由于美国公司进行技术封锁，所有机台的网络端口都无法使用，如果要开通设备的网络端口，要花费近 100 万元。面对如此昂贵的费用，时任武汉富士康金机虎公司的最高行政主管、资深经理郑国辉指示：“想尽一切办法攻克此难题！”我临危受命，找到公司资讯科技、设备维修等技术部门探讨，始终都无法解决此难题。当时设备已经运到了厂房，眼看着一台台设备陆续通电通气，就是不能传输程序。我立刻组织专案团队，仔细研究机台，结合自己所学的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知识，绕过网络端口，研发出哈斯设备传程硬软件装置，成功解决了哈斯设备传程难题。此技术获得公司高等改善奖，申请了公司专利，并且推广到深圳、成都、衡阳、烟台 4 个厂区。我一鼓作气，开发出精密量测数据自动处理系统、JG 机台转程软件，主导完成线割工时预估系统、哈斯自动化上下料机等重要专案。

2017 年，为了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武汉富士康在华中地区布局自动化产业，上级主管找我谈话，让我转型负责自动化开发工作。冷静思考后，我毅然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2017 年 8 月 8 日，我被派往深圳总部学习自动化开发技术。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半年的学习时间里，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周末在图书馆里学习，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学习自动化技能。如今，转型从事自动化开发工作已有一年多了，我带领 18 名资深工程师转型发展自建团队，共承接自动化案件 120 多个，服务高端手机精密组装流水线 2 条，培养创新人才 22 人，申请国家专利 10 个，成为集团人工智能种子讲师、专业技术类讲师、管理类讲师，积极传承新技术、传授新知识。2017 年，我被湖北省模具工业协会评选为“湖北模具杰出工匠”；2018 年被评选为“匠心模具精英”，同年获得“武汉大城工匠”称号。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工业 4.0、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我们产业工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决心扎根发展，做知识型、科技型、创新型的江城富士康人，在创新奋斗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朱川峰：武汉富士康科技集团金机虎事业群创新设备研发单位专案经理）

一鳞半爪说学缘

◇ 王先霈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建系初期的教师队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系调整中，由若干所大学中文系教师组合而成的。老师们的学术经历、学术背景彼此相异，各有所长。到我进入本科一年级的1956年，改制前的华中大学和老师们早先各自从教及就读的其他若干大学，都被叫做“旧大学”，学术传统已经不被提及，我们对于本系教师的学缘结构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老师们在讲课中还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给同学们留下印象，并且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多种影响。可惜，我们一年级的末尾，就遇上“反右”，二三年级又是“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老师们的学术个性难以表现和发挥，年轻懵懂如我这样的，没有能够自觉地、系统地在比较中学习各位老师的精髓。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从当年一个普通的学生和青年助教的见闻所及，以及从一个特定角度能够回忆起的，只能是一鳞半爪的淡淡微痕。

我的中学母校是九江市第二中学，它的前身是同文中学和儒励中学，两者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同文是男中，儒励是女中，和华中大学属于同一个大系统（都与美国的耶鲁大学长期维持着联系），历年毕业生很多被举荐到华中大学深造，老师中也有不少华中大学毕业生。当我准备到华师报到的时候，语文老师李步青先生特地为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持此信面谒他的老师钱基博教授。他给我介绍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力量，说钱老不只是精通国故之学，而且思想开通，注意吸收西方学术成果，注重学术对救国图强的功用。抗战期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开设“《孙子》讲读”课程，

出版《孙子章句训义》，联系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和欧洲战例讲解；又与他人合作出版《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在国学家中显示出独特个性。当时中文系在桂子山，而钱老住华中村，相隔颇远，我又怯于拜见这样的大师，那封信放在箱子里，直到钱老病逝始终没有拿出来。只是，我知道了学校里有一些大学问家。

2006 年年底，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会。其间，香港作家联合会潘耀明会长请吃饭，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邵燕祥先生，他问，“你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熟悉高庆赐先生吗？”我说，“我读一年级他就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最受学生欢迎。你认识高老师？”他说，“那也是我的恩师。”原来，邵燕祥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高先生是他的国文老师，师生情笃，以后几十年保持联系，直到高老师 20 世纪 70 年代末去世。高老师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北大学和华中大学任教。他既熟悉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古代声韵之学。现代汉语基础课语音部分的内容，照说是比较浅显的，他讲来却极富韵味。引用儿歌、民谣、绕口令、古诗词，讲得生动活泼，他的分析和讲述既易懂又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后来他给下面的年级讲古代汉语，也是很受欢迎。1969 年，已近耳顺之年的高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维修扩建王家墩飞机场的繁重劳动，白天睡在附近地质学校走廊地面上，晚上出工推百余斤的水泥车上高坡，对他身体伤害很大，回校便尿血，从此体质一蹶不振。高老师学术思想开通，乐于吸收新知。记得 60 年代初，他手上没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听陶军教务长哲学课上讲到毛泽东提倡“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便叫我给他找到出处，准备作为讲修辞的材料。高老师那时陷于不利处境，他询问时的客气使我很不安，而能为自己敬佩的老师服务，又使我欣喜。他特别善于表达，讲课干净利落，没有闲碎言语，普通话纯正，音色浑厚（高先生的京剧唱得很不错），教态庄重、沉着而亲切。他的教学风范是我终生仰慕，想要模仿而不可得的。近年，我无意中得知，高老师还是新批评派的开创者理查兹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评论者，他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以理查兹为研究对象。他的论文题目是《吕嘉慈底文学批评》，共五章，由郭绍虞和周学章两位先生评阅。

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邵子风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邵老师个子小，身材精瘦，说话轻言细语，态度和蔼。在 1958 年“厚今薄古”学术大讨论的气氛中，在礼堂里给 300 人上大课，给那些古代文化素养很差的学生讲什么“守温三十六字母”，“见、溪、群、疑”，“帮、滂、并、明”，也真难为他老人家。多年之后，我读杨树达先生《积微翁回忆录》，里面几次提到邵老师。如 1935 年 4 月 7 日：“阅邵子风所撰《晓匣旧读考》。谓古无浅喉音，皆读牙音见、溪；多从异文及声类证明。”1936 年元月 22 日：“邵子风赠所著《甲骨书录解题》来。”《甲骨书录解题》由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出版，是同类书中较早的一本，现在很难见到，已经近乎文物了，网上竞拍开价一本千元。此外，何泽翰老师是杨树达先生的入门弟子，《积微翁回忆录》也提到他。在那个年月很难施展才学，后来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去了。据说他收藏有《聊斋志异》的某个善本，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风雨声中，中华书局还派人来学校找他，想要影印这个本子，不知道后来到长沙找到没有。

杨潜斋先生的专长在文字和声韵，曾

在中央大学、南开大学讲授相关课程，但他教我们的是《语言学概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索绪尔的一些观点。他的讲义比他课堂上讲的更加严谨，其中不少是他从很新的外文资料里得来的，而那以后很长时间，他介绍过的西方学者的名字都很少在大学课堂上、学术刊物上被提及了。

我入学时系主任是陈宣先生，他是“左联”成员，从中原大学过来的。陈先生去世后由方步瀛老师接任系主任，方先生 30 年代前期中央大学毕业，他是古典文学教授，最先却以训诂学研究名世。1942 年发表《连文析义》，我刚进校读书时，看到过他在学报上关于连绵词研究的论文。他不只是打通了古代文学各个阶段，还打通了古代文学和古汉语两个学科；60 年代初他给青年教师讲授《文心雕龙》，则体现出他颇深的文学理论素养。系里师生都知道方先生善于背诵，每天见他从华中村居所到昙华林教工食堂来买饭菜，一路上喃喃自语地背书。讲课时也是大段背诵古典作品，一口余干话，连我这个江西人也听不很明白。田蕙兰老师模仿方先生吟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很是传神，不熟悉的人会以为是在说外语。但那抑扬有致的声调，比之于现代普通话的念读，更能让听者走入原作的意境，让我们恍惚间听到两千多年前南方少女唱的《红莓花儿开》。方先生绝非食古不化，他很关心文艺现状。1965 年暑假前，我从北京回来，他以系主任和老前辈之尊到我的寝室，具体了解当时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情况，使我十分意外，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他曾担任《长江文艺》的编委，2009 年湖北省作家协会编选六十年文集，在理论卷里收录了方先生的《〈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当年的编辑刘岱同志回忆说，文章出于老先生之手，却充满时代青春气息。比如，“精神生活如此丰富的杜丽娘，寻求爱情自由和反对封建压抑的苦闷，既不能在游园中得到排除，反更从花鸟上增添了新的感触和怅惘。这种心理上无穷的、此继彼续的矛盾变化，便促使她再进一步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新的要求的产生。”“封建压抑的苦闷”，今人谓之“性压抑”；“心理上无穷的变化”，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方先生那时只能委婉曲折地说出。这些正是《牡丹亭》的精华所在，是明代新思潮在文学上的最好体现。此文如今读起来，依然生气流溢。

石声淮老师也是以他的博闻强记，使历届学生惊叹而敬佩。其实，未必老一辈的教师人人都是天生异秉，后来的学人个个都在生理上退化了。老一辈们首先是肯下苦功去背，更重要的是多有“理解之同情”，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背诵。1986 年，我和石老师一同到黄石，分别为湖北师范学院学生做古代文学和文艺学讲座。晚间两人在宾馆休息聊天，他说，年轻的时侯向华中大学英籍女教师借阅原文本哈代的《还乡》，个把星期看完了去还书。女教师说，“这样精粹的文字，你这么快就看完了？”把石老师批评了一顿，让他拿回去重新读过。的确，《还乡》对英格兰乡村自然风光的描写，是英国散文的精品，需要一字一句品读。可以想见，石老师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更是沉潜往复，浸润其中。今人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专心致志，石老师给我讲这一段往事，是对后生小子的教诲。大家都知道石老师是钱基博先生的东床，师母钱钟霞一辈子相夫教子，家务之余研究联语，颇多心得。1970 年在凄风苦雨的大冶北练山，石老师躺在地铺上给我说师母收集的对联，如某地武则天

祠前有集句联：“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旒”，他轻声念诵，我凝神听着，在那肃杀的环境中得到片刻的放松。到了80年代，石老师听我说在讲“文学语言独立的形式美”，便告诉我一些“无情对”，联语对偶工切精巧，而意义毫不相干，比如“木已千年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宫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这类例子，我用到课堂上，很为听课人所喜欢。石老师懂音乐，嗓音醇厚。某年，日本有吟诗舞剑团到访武汉，要找人切磋汉诗吟诵，接待部门到处寻觅，最后请石老师出场，客人大为折服。

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胡雪先生，据说懂五国语言，在大学教过英语，最擅长的应该是日语，因为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看他一派绅士风度，却曾进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日宣传核心小组文艺写作组组长。他很早就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本署“胡雪、由其译”，近些年却颠倒过来改成“尤炳圻、胡雪译”，不知是何缘故。2005年8月，我接待日本翻译家代表团，团长是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岸阳子，我向她介绍夏目漱石《我是猫》的中译者是我的老师胡雪先生，她当下向她的团员们叫一声：“吾輩は猫である！”很是兴奋，这也算他们到武汉的一个收获吧。我的同年级学长陶才碧大姐最近对我回忆起：胡雪老师在“红专大辩论”中，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从容地走上讲台舌战群儒，那镇定自若大异于平时温文尔雅的坚毅形象，和他“一锄头挖不出莎士比亚”的名言一起，深深印在了学生们的心中，至今我们聚会还常常忆起。和陶大姐同一个小班的刘汉明学长彼时加以发挥，说是“一锄头也挖不出古汉语”。可见，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授业，还有对于科学、对于真理的态度，那也许更为重要。

至于说到后来一辈的教师，大部分是本校本系毕业留校的，似乎颇有“近亲繁殖”的嫌疑。不过，系里很早就有意识地一茬茬地派出青年教师到外校进修，这在本系的学科建设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本系能够不停地追踪国内先进的水平，广纳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当时决策者的胆识，真可钦佩！我所知道的，例如孙子威老师1954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先生处进修三年，当时北师大举办文艺理论研究班，朱光潜、蔡仪等名家都到那个班讲课，孙老师都聆听过；王忠祥老师1954至195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攻读世界文学专业，指导他的是穆木天教授；周乐群老师1956至195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导师是苏联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专家季莫费耶夫的学生柯尔尊教授，班主任是著名外国文学专家彭慧教授；贺兴安老师1959至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学习，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届研究生班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个；丁成泉老师到四川大学进修；祝顺有、闭克朝老师到北师大进修，导师是俞敏先生；刘兴策老师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班学习，由丁声树、李荣等先生授业……好多老师都曾脱产长期到外校进修。到了60年代，奠自佳、李思维等老师脱产到武汉大学等校进修；朱宗尧老师到华东师范大学，师从施蛰存先生。我在施先生的《闲寂日记》里看到，“为朱宗尧选定必须精读之杜甫诗凡五十八首”，“朱宗尧来质疑，谈杜甫诗”等若干条记载。朱老师后来在唐诗研究上的成绩，

和那个时期的深研苦读分不开。附带说，《闲寂日记》还记载了朱伯石老师，朱伯石老师和万立丰、欧阳德威等老师，是50年代中期从中学优秀教师中选调的，他们都有很深的学术积累。施先生在厦门大学教过朱伯石老师，《闲寂日记》中说他“今年（1963年）亦四十四，无复少年时期神情矣。”现在，施蛰存先生和朱伯石老师以及万老师、欧阳老师都早已作古，思之能不慨然！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也一直接受进修教师，并举办过进修班。在这里长期进修过的湖南的羊春秋、山西的顾植、武汉的李悔吾等多位老师，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所在学校、所在地区的领军人物。派教师外出进修和接收外校进修教师，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彭立勋、周伟民、梁异华、徐纪明、胡亚敏、吴满珍、柳申林等老师，都曾外出进修，后来改叫访问学者，因为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普遍实行，逐渐衰微。

前面提到的那些研究班、进修班，不但都请到多位国内一流学者授课，而且各个班里成员来自全国，其中既多青年助教，也有学有所成的讲师、副教授乃至于个别教授，还有在高校中文系和地方文联、作协担任负责工作的带头人。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在一起学习，思想接触碰撞，思路格外开阔活跃。我也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讲课的有何其芳、冯至、肖前等杰出学者，邵荃麟、陈荒煤、张光年、林默涵、冯牧、侯金镜、李希凡等文学批评家，赵树理、周立波、梁斌、袁水拍等作家，戈宝权、袁可嘉等翻译家，以及音乐家马可、民间文艺研究家贾霁等等。同学中华东师范大学的黄世瑜入学前就参加了以群先生《文学基本原理》的编撰，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民本身也是作家，同寝室的史如北是一位有丰富的文艺工作实践经验的年轻的老革命，和他们类似的同学还有不少。和这些大哥大姐朝夕相处，他们的示范、激励作用是任何老师也无法替代的。当时没有学位制度，进修的人倒也少有其他功利考虑，只是想着多读几本书，多向平时难得亲近的大学者以及辅导老师和同学学到治学方法。进修的人带回来多种多样的学术作风、研究思路，和在校内辛勤工作的老师们一起，为我们系80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细细想来，当年我们系的学缘结构实际上一点也不差。如今，制度和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经验是不是仍然多少有些可取之处呢？

往事如烟，慢慢淡散去矣，六十岁以下的同人对此已少有了解，以上不过是白头宫女的絮叨罢了。

（王先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回忆站讲台的日子

◇ 王延武

走进民院

1981 年夏天，我即将读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到何处去？海军工程学院的当年战友来找我，要我“归队”，可将原有的军龄、工龄连续计算，待遇从优，但必须去政治教研室。我在社会大学游荡多年，好不容易进了历史学名师的门，如果舍弃专业，对不起先生。考虑几天，我婉拒了。

我试着向当时华中师范学院的领导提出申请，领导表示可以考虑。这时自己又突生顾虑：先父在华师声誉颇高，现任领导均看着我长大，余荫虽好，不可安享。

正在犹疑之际，原来的工友告诉我，他现在与中南民族学院白院长的女儿在一个单位，听说民院正在招募教师。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到民院不错，不会离开历史学专业，也不会有依托前辈余荫的压力，便托工友向白院长的女儿探听消息。两三天后，工友就转交了白院长女儿给的几张“线索表”和华师家属宿舍的一处地址，并交代：填好表，可以到这处地址交表。随即，我收到参加我硕士答辩的吕名中老师来信，信中大致介绍了一下学校复办情况，并说：“知你有意到民院，非常欢迎。”同时留下了联系方式。

我没有与白院长的女儿面谈，就获得如此确实的反馈，这让我感到民院招募教师的诚意。从白院长女儿的行动和吕老师的来信中，可以推知白院长实干的作风。于是，我不仅自己填表，还将这事在武大研究生宿

舍稍做宣传，也顺手发出几张表格。几十年过去，我一直不知道白院长这位女儿的名字，也不知如何道谢。为写这篇文章，才打听到她是白幼平女士，我在这，郑重地向白幼平女士道谢。

我与同学陈勇（他到民院工作几年后，回武大读博，便留在了武大）一起到华师交表，接待我们的是民院历史系的罗少兰副书记。罗书记很热情，向我们介绍了民院的历史和复办的过程。她说："现在的建设，是按照学生3600人的规模。建设思路是'先生活，后生产'，要先解决好老师、同学们的生活条件。教师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考虑，不能让老师和同学们在很困难的生活状态中上课。"听到这，我与陈勇都相视微笑。当时，武大也就5000多个学生，民院的规模也不小了。人性化的建设思路，尤其是解决住房，对我们有老有小的人来说，更是有吸引力。人还没有到民院，民院的人性化建设思路，已经给了我们温暖的感觉。

不久，我又约了几位同学到民院转了一圈。路还是沙石的，南湖边的校园中有一山丘，1号学生宿舍楼、1号教学楼及1、2号单身教工宿舍，东家属区的几座教工住宅楼已经耸立起来，大礼堂等建筑的地基也有了模样。一座新的大学城正在拔地而起，同行者感受不一，有人说太偏僻，有人说大有信心。

10月中旬，几位同学一起到民院报到。办手续时，人事处处长杨长恩过来简单谈了几句，我感到这位处长没有架子，不说空话。具体经手的陈耀坤科长春风满面，使人对民院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到历史系办公室报到，是在刚建好的1号学生宿舍2楼。系主任杨昌沅、书记韩荣宝和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吕名中等都在。杨主任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你们的情况我看过档案了，你们没有试讲，试讲一次没有问题吧？"我在部队观摩过"郭兴福教学法"，讲过"机场实习"，强调的是精讲、多练。听说要试讲，我不觉下意识地问："讲什么？"吕名中老师就与我商定试讲时间、内容，并叮嘱说："当老师一定要备好课，一节课讲多

1981年，武汉大学1978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毕业留念。前排左三为唐长孺教授，三排右一为王延武

少内容，要有数。这些内容中，有与教材重复的，一定要交待清楚。讲自己心得的，最好能与同学简单讨论一下，忌讳东拉西扯。”他的话不多，却使我心中有了点方向感。后来更觉得这几句话，实在是授课守则。

杨主任又笑眯眯地说：“历史是很生动的，不要把生动的历史讲死了。老先生讲史料，是讲方法，给本科生讲课，要讲点研究方法。”听到这话，我很惶恐，我到哪里找“方法”？杨、吕两位老师可能是看出我一脸茫然，就赶紧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写好试讲提纲，就找我们说说。”

回家我就开始准备试讲稿，写出提纲后交给吕老师审查，吕老师很认真地提出意见，又要我一鼓作气将全部课程的大纲写出来。他强调，要讲好一节课，必须把这节课放在一学期的内容中审视，以避免授课内容的畸轻畸重。听从他的话，我就一面写试讲稿，一面写讲授大纲，渐渐地，我感到这个方法对写试讲稿大有益处。首先，对试讲稿内容在历史时段中的定位有较清楚的认识。其次，对试讲中准备重点讲述内容的因果关系更清晰，尤其是对这个时段中的主次因素为何如此，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试讲稿经过改定，吕老师比较满意。他带我到杨主任家，见到杨主任的夫人范植清老师。没有多寒暄，他们三人就要我“说课”。我一时不知道说啥，经过提示，才理清头绪。对一节课做如此要求，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多年以后，我对这种“小题大做”却是另有感受了。

试讲，是在一间芦席棚子中进行的，到了不少老师。讲完后，杨主任、吕老师等老师对我的讲课内容还比较认可，但对我的板书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一是纲目不清，二是字太丑，三是随处写。他们要求我做好板书的设计，左边黑板写纲目，右边留出一块写史料或提示学生注意的字、词。答振益老师说：“给本科生讲课，可以写文言文史料，但一定要通俗讲解。来不及板书，也要口语化解释一下。”他还提醒说：“现在图书馆还在建设，学生不一定能借到史籍。”冯来仪老师说：“学生来自民族地区，有的有语言障碍，老师要耐心、关心、细心。听试讲的都是老师，你可以一气讲下来，面对同学，就要讲一段，问一下，听明白没有？笔记记了没有？”还说，“擦黑板要有序，轻拿重按，避免粉尘乱飞，对自己和前排的同学都有益。”到最后，几位老师都笑着说：“你要学会用嗓子，讲课抑扬顿挫，不但能使听讲的感到有味道，也是保护嗓子的办法。上课是可以带杯水的。”

听几位老师提意见，我最先冒出的想法竟然是“在群众大会上念致敬电、批判稿、传达上级文件比上课容易”，不觉就说出口了，这就使各位相识不久的老师感到有必要让我尽快知道老师站讲台的特殊性，不停地将自己的上课体会一一相告。越听，我越觉得站讲台不能开玩笑，真是要用心去消化老教师的意见。当然，要能够真正把握讲课的精髓，还是要靠实践。

经过试讲，我算是被民院正式接受了。

初站讲台

我正式上课，是接石昭明老师的课，任务是给中文系 1981 级同学讲《中国通史简编》，内容是魏晋至清末。石老师有教学经验，这个班的同学适应了他的方法。我却感到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课，知识点基本上一致，如“赤壁之战”“安史之乱”“元末农民大起义”等，手中使用的教材在知识点方面变化也不大。按照教材讲，同学们会感

2001 年，王延武（左一）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到缺乏新鲜感，失去兴趣，我便把“构清轮廓，理清线索，提示考点，补充论点”作为讲课目的。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上课老师要深入到宿舍，与同学交流。我到宿舍听同学对讲课的意见，同学反映不一，有表扬，有批评。批评的话很尖刻，说“不讲还明白，越讲越不明白”，这真令人郁闷。这个班的班长是白江源（现为民大副书记），他告诉我：“中文系同学对史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还是有兴趣的，但更关心考试成绩。课堂上听得热闹，下课一想，不知考试考不考，就有些烦心。再说，这门课毕竟不是中文专业的主课，课外作业有些题同学没兴趣做，课外作业最好就是要考试的内容。”这个提示使我很受启发，我开始注意在教材中将必考的知识点提示清楚。对在课堂上介绍的史学新认识，讲明自己采信的意见，对其中一些也作为必考知识点，加以强调。对课外作业，则以便于同学巩固应知、应会的知识为目的。为扩大同学的知识面，我就多留几个思考题，请有兴趣的同学在课外阅读中可以有点“问题意识”。对思考题，我在课堂上会略做解释。

我讲课的这个学期，教研室组织老师来听过我的课，我也去听过其他老师的课。我感觉老教师们几乎个个在课堂上强调，自己上这门课就是为同学们进入历史学专业提供门径。这种强调，我是“始而笑，继而惑，久而服”。当时，自己似乎没有这种自信。如此讲了一学期，我感到有点收获。教研室要求写学期总结，提笔时，我把经验、教训梳理一番，主要的心得是“依据教材，看准对象，突出重点（考点，大纲要求的应知、应会知识），适当拓展”。这个总结，几位老师看过后都给予认可。后来又给非历史专业的同学讲了几轮，反映还好。几年后，有次我从公汽上下来，听到随后下车的几位笑说“是朱元璋，是朱元璋”，不觉回头探望。我最大的智力缺陷，是记不住交往者的模样、姓名。所以，望过去是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其中有位见我回头，就问：“是王老师？”我立足、点头。他们走到我近旁，一一握手问好。原来是几位在武汉的中文系 1983 级

同学。他们说，在车上看见我了，见我看他们时面无反应，以为认错了人，下车后才确定是我。一同学解释说："您讲朱元璋一节，我们印象深，私下就称您朱元璋。"我听后大笑说："谢谢你们能够记住我的一节课。"我回想讲明朝初期，朱元璋把"士大夫不为君用"设为罪名时，略以"孔乙己""范进""吴用""诸葛亮"及传说中的"刘伯温"为例，对封建时代一般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稍许展开分析了一下，告诫同学要跳出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做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自立利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学生对此有印象，是讲课有效果，他们给我一诨号，也是自己可以存在学生心中的佳话。这讲台算是站住了。

再受教育

1983年，学校送一批老师到名校进修，我有幸被派到北师大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史学概论》讲习班学习。初见白先生，先生便说："我讲了多年历史唯物主义的课，越讲越感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历史学的方法论有关联，却又有别，不能简单地取消历史学方法论。这个想法过去不许讲，我就自己思考。现在解放思想了，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有了这个讲习班。"

白先生的话，电闪般劈开了我的一段回忆。有次在唐师长孺先生家，师兄弟各自汇报读书所得。有位师兄汇报完后，即请先生讲讲自己的方法论。唐先生闻言，先是沉思不语，而后说："我的方法就在我的书里呀。"提问的师兄期期艾艾地问："总有条重要的吧？"先生又沉思了片刻说："与虎谋皮。"便又沉默不语了。另一位赶紧接着汇报。可是，似乎师生都有点失去精神的样子。汇报完毕，我们离开先生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无人说话。一位师兄实在憋不住，就问大家："先生说'与虎谋皮'究竟何指？是先生舍不得传授？还是避之不及？"后来，一位师兄说："你们忘了大批判了。"确实，"先生有难言之情"。后来，唐师个别接见我时，要求我补看一些与史学思想有关的书。我理解，这就是唐师讲史学方法的开端。但唐师后来还是没有说过自己的方法论。

白先生的话，说破了老先生们当年"难言"的困境。被教条化、凝固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创始者的本意已经背离，如何能正确指导历史学的研究？唐先生的研究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精髓，而绕开了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在思想固化的年代，已经被一些人指责，甚而要批判。唐先生如何能够明白宣示自己的研究方法？白先生要以"史学方法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真是有胆有识。

《史学概论》讲习班的同学中，才俊多多。武大的祝马鑫老师是"文革"前的研究生，有多年讲课经验，也有抡大锤砸石头的经历。湖大何晓明、华师邓宏光老师学有渊源，又曾在广阔天地摔打过，开朗幽默。甘肃师院的李清凌老师通读了《列宁全集》，他开口"列宁说过，……"便向我们传授了经典知识。河南师大的李振宏老师年轻，勤学而有悟性，他课余便探讨马列主义的终极目的，钻研马列主义经典很有心得。还有青海师院的纵瑞华老师，经过不少磨难，仍然潇洒平和，他教过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强调对少数民族学生"一定要尊重"。他们讲讲上课感受、课堂轶闻，对我都是极好的营养。

白先生忙，亲自授课的时间不多，但每次授课总能激发我们对历史学功能、走向

2011 年，王延武参加中南民族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留影

的思考，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近代化过程的审视层面。刘家和先生的学问兼通中西，在讲课中比较了中西史学的走向和异同。瞿林东先生讲到中国传统史家，每每有独到的见解。其他先生的课程有《中国近代史论》等，听后觉得自己充实了许多。我在师大还旁听了刘乃和先生给本科生上的《史料学》，刘先生上课，语气亲切，条举事例娓娓道来，韵味丰富。还有幸拜见了何兹全先生，何先生谈到上课问题时，笑说："当老师怕空，怕陈陈相因。一段时间里，老师不怕空，不怕陈陈相因。以后还是要怕就好。"

在师大受教数月，得知唐先生在北京饭店开会，我就去探望。我向唐先生汇报了在白先生门下听课的感受，先生听后，兴致勃勃地说起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流行的史学理论流派的源流，还略有评论，言简意赅，味道无穷。从北京饭店出来，在月色下踏着道上的积雪，我感到非常愉快，对历史学"是什么学科"比以前认识要深刻了。

站讲台

进修回来，我一边开史学概论课，一边回武大听唐长孺先生的课。听课之余，若唐先生精神还好，就趁机将上课中的困惑向先生倾诉，先生常常用不多几句话，即使我醍醐灌顶。如我问："我们习惯从立场、观点、方法角度去阐述史家的主观性，但不能完善解释有些传统史家何以有超越其阶级立场的批判性？"先生回答："对历史中社会现象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制度的批判，超越阶级立场的说法也要斟酌。社会中人是复杂的。"

除向先生请教，我还向同学请教。这个请教，是在征求意见、讨论问题中进行。我自己是现学现卖，不敢在同学面前故作高深，在课堂上也只敢讲"这问题我无研究，你们还可以深入"或者说"咱们各抒己见，看看能否有个大家满意的结论"。当时的同学中，好学深思者不少，也敢于发表与我不同的意见。有时师生在课堂上相互辩驳，课堂气氛反而格外活跃，自己大有接受再教育的感觉。孔子"教学相长"一语，大约就是指老师要从学生处吸收灵气与知识。老师与学生相互问疑辩难，确实是沟通师生情感、相互激发思考主动性的好方法。

我上课，凡到自己还不理解或有疑惑处，就在课堂上提出来，通过师生交流，促进自己思考。讲"诸葛亮的隆中对"，我就

在课堂上提出陈寿在《三国志》中是以后来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描述二人隆中会面，故后世将这谈话称为“隆中对”。由此推想，陈寿有可能以已经存在之现状，倒叙诸葛亮之远见，也显示刘备之延揽英雄的气魄。不过这个猜想，还要在史籍中找依据。这就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讲“赤壁之战”，我就议论说，冷兵器时代，虽然一战定大局的事例不少，但造成三国鼎立的其他因素不可忽略，可以再搜寻史料，以求全面把握史籍提供的历史样态。这就将史家描述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区别。同学们参与讨论，提供设想，我便一面当老师，一面当学生，在讲台上丰富自己的认识，学生也比较喜欢听这样的课。

后来，我曾经主讲《旅游学概论》。这门课，我既无师承，又无研究，就老老实实向同学交待，“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争取将这门课程在旅游学中的地位、意义搞清楚。”上课，多以问题切入。有时，一堂课就是讨论一个问题。如“旅游产品”，从概念，到实际，我和同学共同讨论总结，同学们也就原谅了我客串旅游学的举动。当然，也遇到过自己的“滑铁卢”。有一段时间，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心动过速，最糟糕的是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上课要靠吃药维持。故而在给两个专修班上课时，我只能坐着给同学讲课，讲课也没有多大劲，又不能深入学生，同学意见很大。我很理解同学的意见，自己做学生时，讨厌懒洋洋的老师，自己懒洋洋而被学生讨厌，天经地义。站讲台而不付出足够的热情，学生一望即知，这是掩饰不来的。至今思之，还觉愧疚。

有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对站讲台、站好讲台之间的差别有了体会。站讲台真不易，想站好的目标，至今就没有达到。我在学院的会议上说过：“50 年以后有人看你的文章，你才算是学者。院长、书记之类的职务，是领导给的‘使职差遣’；教授，是小学术圈中的同行认可；老师，才是我的终身职业。所以，请大家就喊我老师，不要喊别的。”这几句话，当时刚到学院的青年老师们都记住了，他们就一直喊我老师，直到现在。说心里话，我有站好讲台的愿望，但到最后也只是站讲台。虽然如此，民大，给我提供了三尺讲台，是我真正站讲台的新起点和终点。每思及此，当我要感谢所有引导我的老师时，我应该认真地说：“感谢民大，感谢给我提供三尺讲台的民大。”

（王延武：原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从大山深处走来 朝城市深处走去

◇ 田祚雄

向往山外世界

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鄂西南巴东县大山深处，是个地道的土家汉子。经由大山的哺育，勤劳朴实、热情憨直的土家族性格特质，深深融入作为土家人后裔的我的血脉。

大山的孩子劳作早。小时候放学后，我帮着家里扫地抬水、烧火推磨、养鸡喂猪，上山放牛放羊、砍柴割草、摘果拾菇，下地扯黄豆、种洋芋、掰包谷，啥活都得干。贪玩是孩子的天性。真干起农活来，日晒雨淋、草扎叶划、负重爬坡……远不像文学作品描写的“炊烟袅袅、硕果累累”那样美好，又苦又累、腰酸背痛才是常态。

不知从何时起，大山外面的世界是啥样，便成为上山放牛放羊的我，最常登高远眺时畅想的问题。尤其是每当干农活和家务疲累的时候，就强烈地想着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生活。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想要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啥样，就要亲自去看一看。如何才能走出大山？如何才能摆脱干农活的生活？唯有读书！只有读书写字时，父母才不分派干家务和农活的任务；知识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能获取知识，才可能走出大山！

循着这个最朴素的想法，发奋读书成了我最强劲持久的动力，成了逃避干农活的最好借口，成了走出大山最可能的捷径。

1986年，我考上了官渡口镇重点初中，从半山腰来到巫峡口的长江边，实现了走出“山村”的小目标。读初中的我更加勤奋，目标更加清晰，“我要考上恩施州最好的高

中，然后考个大学。”但是一向成绩很好的我，在中考填报志愿时却与父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2012 年 1 月，田祚雄（左二）带领工作队开展塘堰整治摸排调研

20 世纪 80 年代，因为中专生包分配工作，农家孩子考中专“跳农门”成为普遍选择。我家兄弟姊妹多，家庭条件相当艰苦，故填报中考志愿表时，父亲坚持不准我填高中只能填中专，“你填高中，我就没钱供你读了，以后考不考得上也不晓得。”他甚至提前给班主任马光明老师打了招呼，让他劝服并阻止我填报高中。

30 多年过去了，我仍清晰记得当初中考填志愿表时的情景：同学们都是拿着志愿表自己填报学校，马老师却把我喊到身边说：“你爸跟我说了，要你报中专，早点出来工作。来，你说我写！”

志愿表填完后，从学校回家的 30 公里，我一路步行，一路落泪……

回家后，母亲看着我红肿的双眼，边流泪边劝慰我：“以后还有机会，上班后还可以读函授大学，边拿工资边读书更好嘛。”

后来中考分数公布，我以高出恩施州最好高中录取线 20 多分的成绩，被建始师范录取。有意思的是，我们班成绩好的同学几乎全读了建始师范。因为当时中等师范学校不仅包分配还发生活费，这对贫困农家孩子来讲，的确吸引力不小。

由此，我的中师生涯开始了，我实现了走出“县城”的目标，但仍没有走出大山。

中师三年，我除了很认真地学习书本知识外，开始注重培养面向小学全科（不含英语）教学的各种技能，包括音体美、普通话、粉笔字等，样样都得会。我尤其喜欢练习硬笔书法，一有空就在黑板上练习粉笔字板书。没成想，无心插柳柳成荫，善写粉笔字竟成为日后实现大学梦的敲门砖。

1992 年春，从乡下小学实习回校不久，班主任隗永祯老师告诉我，学校有两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主要是为学校培养后备师资。学校按照三年来的学习成绩汇总排名，以 3：1 的比例选派前 6 名参加两所师范院校的考试：前 3 名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考试，后 3 名去湖北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考试。我成绩进入前 6，可以去参加湖北师范学院的考试。“如果考上了，四年后要回师范工作。”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寂灭多时的大学梦又重新燃起了点点星火。

学校派专车专人带领我们到武汉、黄石参加考试。考试由语数笔试和试讲面试构

成。笔试我数学考得不够好，排名第二；但试讲面试时，我的口语表达和粉笔字板书，让评委老师眼睛一亮。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主持面试的李晓明副书记，当面夸赞我粉笔字写得好。这样，我以综合成绩排名第一而被湖北师范学院（现改名湖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

四年大学生活，我见识了山外的世界和大城市的生活。四年后，按照约定，我回到建始民族师范学校（由建始师范改名而成）任教，当班主任兼任学校团委书记。

时代的脚步总是行进得很快。1996 年我大学毕业时，大学生已不包分配，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已经开始。我意识到，中师生也将很快失去包分配的保险箱和铁饭碗，于是我开始报考硕士研究生。

留在繁华都市

1998 年，我考上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三年全日制脱产学习后，我顺利毕业。彼时的师范招生已很困难，我重新择业，选择留在了武汉。至此，虽跌跌撞撞，但竟然实现了儿时放牛放羊、逃避干农活时的梦想——走出了大山。

因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兴趣浓厚，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从事理论教育、宣传工作两年后，我转岗到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担任党组秘书，直接从事一线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服务和研究工作。我坚持既服务科研工作，又从事一线科研实践，在从事科研中更好地换位思考、主动服务科研工作。我努力将所学专业与武汉实际相结合，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攻方向，主动按照科研人员标准考核自己。

我先后承担十多项重点课题研究，撰写的咨政报告《深化和谐社区建设促进城市科学发展》刊发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武汉市农村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武汉与大连经济发展比较》获武汉市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均产生较好社会效应。参编《厚植城市文化的土壤》《武汉制造：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专著多部，在《学习时报》《湖北大学学报》《三峡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为了更好地了解基层、把准市情，让社科研究更接地气、更切合实际，我积极争取下沉一线实践锻炼的机会。

2011 年年底，我响应组织号召，带队赴新洲区三店街蔡畈村，驻村开展“三万”（即“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我们进村入户到田头，宣传惠农政策、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村民诉求，带着感情帮扶、带着问题调研、带着激情工作，筹集近 10 万元资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村民建成 8 口当家塘。同时，利用社科研究优势，开展武汉市农田水利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撰写的研究报告得到市政府分管领导的肯定批示，并获第五届湖湘论坛征文二等奖；开展农村土地抛荒情况调查，撰写的《农村土地抛荒需警惕》被市政府办公厅采用，并在《中国乡村发现》2013 年第 2 期公开发表。

通过开展“三万”活动，我对武汉农村有所了解，但“三农”问题毕竟不是武汉面临的主要问题。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作为地方城市社科院，当然要以研究城市问题为主。正当我谋划研究重心转移时，恰好武汉市委组织部选派年轻干部下基层锻炼。我有幸被组织选中下派，于是，有了亲身参与和抵近观察城市基层治理的契机。

走近城市治理

2015年4月，我被正式派往东西湖区长青街办事处，挂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市管理、招商引资、环境保护、文体卫教、水电气信等工作。

老实说，从一个社科研究工作者变身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者，我既兴奋又感觉压力山大。工作头绪多、难度大，自己经验缺、自信弱。特别是街道辖区沿着107国道分布，辖区内物流企业多、流动人口多、交通秩序差、安全风险高、城市管理难度很大，“不出事则已，一出就是大事”。

刚到街道挂职不久，我就接到居民投诉，辖区铁路桥下有人违章搭建储货仓库，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更威胁铁路运行安全。区委、区政府要求街道会同区城管委进行执法，限期自拆，逾期不拆则组织强拆。物流仓库涉及巨大利益，业主岂会主动自拆？不出所料，限期时间过了也不见业主有任何动静，我们只能组织强行拆除。

街道抽调科室力量和社区工作人员，区城管委组织协管员队伍和执法队伍，调来挖掘机和推土机，迅速进场打围，对违建仓库进行强拆。刚拆10分钟左右，违建业主获悉强拆信息，驾车赶到现场。刺耳的汽车急刹声伴随着污秽的叫骂声充斥现场，一个留板寸头、赤膊马甲打扮的男子，下车后边叫骂边打开汽车油箱盖，手握打火机叫嚣威胁：“马上停工，不停工我点火，大家同归于尽！”

看他那激动的情绪，我还真没见过这阵势，生怕他一时冲动、不计后果。正当我思索着如何处置时，还是区城管委的同志有经验，马上叫停现场强拆，向叫嚣男子宣讲政策、警示利害。男子根本不听，迅速爬上搭建仓库的房顶，试图以肉身阻止机械再度作业。

城管队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分成三组：一组声东击西、双线继续强拆；一组打围维持秩序、防止安全事故；一组派人上房围堵，竭力将其劝下。经过通力合作、博弈追逐，终于顺利拆除了此处违章建筑，没有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此后，我还参与处置过夏汛时社区的洪涝疏排、协管队员制止小摊贩占道纠纷等突发事件。通过到街道挂职，我对城市基层行政组织架构、工作领域、运作机制、职能边界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更加了解基层

2019年1月，田祚雄委员参加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接受凤凰网采访

干部和市民群众的工作生活状态和社情民意诉求。

以前，我与很多人一样，也曾有过对基层干部片面、错误的认识，也犯过对基层干部标签化、污名化的错误。其实，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守纪律、讲规矩、真付出、肯奉献的。比如“白加黑”“5+2”成为常态，既要完成上级行政指令，又要遵守法律程序；比如街道工委研究干部“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守规矩、干工作的人吃亏”等等理念思路，都彻底改变了我对基层组织、基层干部的看法。

2020 年 1 月，田祚雄委员就社区治理问题在武汉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发言

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基层更是社科研究课题的丰富矿产。近一年挂职锻炼的经历，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市民群众，为我从事社科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和课题。如悲情如何绑架法理，社区如何负载过重，员额编到底是个啥东西，政府如何走向权能主义，属地管理的真义与误用，维稳与维权的博弈，暴力性执法与执法的暴力性等等，均值得深入探究。

正是有了在街道挂职的基础，我撰写出版了个人专著《变革社会中的街道办事处治理体制研究》，主持编纂出版了《社区“六小工作法”案例选编》，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的存废之争与未来》《社区治理主体的利益博弈与困境破解》等多篇论文，产生了较好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指导作用。

2017 年，作为少数民族代表，我有幸加入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政协委员不仅是一份政治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自加入政协伊始，我便把珍惜荣誉、担当责任作为基本要求自觉坚守，努力做到“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四年来，我共提交 20 份提案，全都被立案交有关部门办理。这些提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注的工作重点、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民生问题的热点难点，如针对城市规划中人性化不够的问题，提出《关于建设更加以人为本城市的建议》；针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提出《关于建立“‘亩均论英雄’统计考核体系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的建议》；针对城市管理不到位、不精细，提出《关于规范我市机动车辆停放秩序及精细执法的建议》《关于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实现城市生活高品质的建议》；针对城市

社区治理水平不高，提出《关于加强我市商品房住宅社区矛盾调处与治理的建议》《关于切实加强社区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针对市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普遍关切，提出《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治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建议》《关于妥善处置拆迁逾期还建，切实回应民生关切的建议》等提案。针对新冠疫情防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与过激做法，我在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 9 份决策建议。这些议题都是群众关心、社会关切、领导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媒体报道、协商办理、社情民意参阅等，均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调查研究始终是议政建言的基础所在，也是履职能力的重要方面。”我的每件提案都是经过大量调查、实地走访、问卷统计、学理论证等提出来的。我多次到东湖绿道，观察、体验到其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对其提出了建设管理升级的建议；通过驻点调研、挂职锻炼，深入街头路面观察体验、访谈交流后撰写的《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建设怡人宜居武汉》，被选中作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大会交流发言，产生良好的反响；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发放 1000 多份问卷、实地踏访宗教场所等，进而提出武汉市农村宗教重难点问题治理的对策建议，得到当时市委、市政府两位分管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批示；通过广泛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撰写的《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治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建议》提案，得到市委主要领导肯定，被媒体报道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共鸣；撰写的《关于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实现城市生活高品质的建议》提案，被选作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与市长面对面交流，还被凤凰网等媒体传播，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被评为优秀个人提案。

2017~2019 年连续三年，我被市委抽调从事作风巡查工作，有了更多的走近城市肌理、发现现实问题的机会。我结合工作实际撰写的《对一起信访积案的几个追问》被国家信访局《人民信访》刊登；远赴天津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天津市破解房屋产权“办证难”的做法及启示》被印发全市各区委书记及规划部门参阅落实；针对新冠疫情可能带来对湖北人、湖北产品的歧视现象，撰写的相关建议被《人民政协报》头版刊发，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说过：“政协没有名誉委员，只有责任委员，所有委员都要尽职尽责，用心用力。” 是否尽职尽责、用心用力，要靠勤奋实干、创新作为的实绩来彰显。围绕城市治理人性化、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主题，我将在提升建言质量与城市治理效用上不断追寻。

（田祚雄：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所长）

一个政协委员的战疫故事

◇ 郑 明

2020 年 1 月 21 日，春节将至，我们迪睿道路科技有限公司决定放假。本来我全家已经买好了去福建的机票，准备在武汉过完三天年，就去旅游，顺便送儿子提前返回位于福建的华侨大学。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一下子年前的计划就泡汤了。和很多武汉人一样，我们开始仓促地进入了一段从未遇到也从未想到过的时光。4 月 8 日，武汉解封，企业开始复工复产。现在，疫情没有完全解除，而我们也进入了常态防疫的阶段。想想，已经 90 余天了。

回想这三个月，那些人、那些事，必将记入脑海，长留心间……

我和我身后的政协力量

封城伊始，作为市、区两级政协委员，我所在的几个政协工作群就自发地繁忙起来。市政协人资环专委会工作群设立了专门的抗疫频道，针对单独焚烧废弃口罩和医疗垃圾问题，封城后所有公共交通阻断、医务人员上下班问题，就近征集酒店给医护人员休息的问题，尽快提高防疫物资分发速度问题等，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都在工作群里一一讨论，也得到了来自各职能部门委员的回应。

而我所在的江岸区政协工作群，委员们自发捐赠了十几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口罩、手套、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物资，往区防疫指挥部和各医院、社区卫生中心送。而我也偶尔穿起防护服，充当运送物资的司机。

2 月初的时候，政协工作群里的声音逐渐安静了下来，除了奋战在医卫一线的、作为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委员外，余下的体制外委员要么去当了志愿者，要么募集物资往医院和社区一线送。大家仿佛都知道，在这个时候，需要跟时间抢人，做“战斗员”比做“参谋员”“监督员”更急需。

2月6日，有位原在商务部工作的同学联系我，告知天津最大民企之一的荣程集团准备捐赠3500万元和武汉的医学院合作成立新冠及传染病的研发基金。我立即向市政协民建界别的召集人李海波副秘书长和人资环专委会的陶存新副主任做了汇报，最后决定通过同济医学院的毛靖委员与同济医学院的陈建国院长取得联系，成立了一个微信工作群。一周以后，荣程集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签订了捐赠协议，后来这个项目也推进得很顺利。同时，荣程集团还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医务系统捐赠了价值1500万元的医用设备和物资。这也是我在战疫期间对接成功的最大一笔捐赠。

3月初，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号召政协委员下沉社区助力抗疫。3月3日，我来到了离家几公里远的丹水池街岱山社区。这是个老年人、下岗人员和低收入群体较多的偏僻社区。社区的防疫物资不充裕，尤其是困难群众提出改善营养问题也迫在眉睫。由于物资一直相对紧缺，之前筹集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都是秒光。到社区报到时，除了捐出了仅有的少量口罩和酒精外，我已经没有一点库存了。我在市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组建的抗疫工作群里发出了信息，很快，市政协常委、市台盟主委刘江东从台盟募集的物资中分出了3000个口罩和50套防护服给岱山社区；市政协委员、市总商会副会长李浩送来了1500余个口罩，又捐赠1万余元从武商量贩店购买了200余份平价冻肉送给了社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年人；通过市政协委员、武汉中商平价董事长张万新的协助，我们陆续买到了几百份平价冷冻肉；市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张燕萍副主任、万松委员组织志愿者采摘并送来了1000余斤爱心蔬菜；胡建明委员向夜班志愿者赠送了10余斤绿茶……这样，本来物资不富裕的老旧社区一下子阔气了，大家战疫的信心越来越足、居民的感谢越来越多。

战疫期间，我们政协委员并肩作战，真正显示了来自于民、服务于民的政协力量。

我和我曾经辅导过的那些创业青年

除了是民建界别的政协委员，近十年，我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身份是创业指导老师。我一直担任着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导师（市人社局聘）、武汉青年创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兼青年创业导师（团市委聘）、武汉创业天使导师团副秘书长兼创业导师（市全民创业办、市经信局聘）。同时我一直联合各部门公益开办着武汉市规模最大、招生人数最多的校地合办创业训练营，并一直参与承办武汉大学生文创大赛（至今已完成三届），和很多创业青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封城伊始，我发现微信朋友圈里的这些学员们就动了起来。

张豪是我们2016年第一批武汉高创之星青创营的学员，那时候还是个“创业小白”，培训后联合武汉工程大学的几个同学开始创业，以拍公益视频为主。1月22日，已经回到黄冈过年的张豪，听到要封城的消息，立刻逆行回汉。他敏锐地察觉到口罩的重要性，联合3个青年出资并募集共计20余万元，购买了120万个口罩，并将其分给一线抗疫单位和市民。后来，他又带领他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为滞销果农销售产品，还深入到雷神山医院为医护人员拍下珍贵的工作照。

赫英北是我曾经辅导过的创业学子，一个2019年才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毕业的新武汉人，也是个“创二代”。由于喜欢武

2020 年 3 月，郑明委员（右三）为百步亭社区对接 25 吨蔬菜

汉，他决定留在武汉创业。封城时，他已经回到哈尔滨看望父母，但随时关注着武汉战疫的进展。他们家的生意伙伴中，有一个在韩国开有口罩厂。小赫通过不停地沟通，说服韩国伙伴向武汉捐赠了 1.2 万个高质量的 KF94 口罩，自己又捐赠了 1000 个。这些口罩通过我送到了十几个抗疫一线单位，发放给转运病人的社区下沉干部、上门排查的工作人员、隔离点的志愿者等等，有效地保障了抗疫人员的健康。

何雅梅是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接连两届参加我们承办的武汉大学生文创大赛，成绩不错。封城开始，她就敏锐地发现医务人员上下班的交通问题，于是迅速组织起了公益司机群，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免费接送。最高峰时，一共成立了 6 个志愿群，每个群中数百名志愿者，她作为调度人员，每天坚持在电脑前协调，为抗疫初期医务人员的上下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还有来自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创业学子郭文华，2019 年 6 月才从学校毕业。看到不少商贩坐地起价时，他决定将自己刚刚购进的 10 万只口罩捐出去。对于创业刚刚起步的他来说，本可以靠着 10 万只口罩的存货挣一笔钱，但郭文华没有这么做。看到医务人员物资缺乏，他又高价买了 5 万只口罩捐给了医务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而同为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19 年毕业生的张文华则迅速带领退伍兵团筹集资金，将 1 万只医用手套等物资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一线单位。

有段时间，我们总担心 90 后是娇弱的一代。但是在这次战疫中，我们发现，90 后和 80 后一样成为了主力，连 00 后都走上了抗疫一线，他们或募集捐赠物资，或充当志愿者，相信通过这次锻炼，这批青年学子一定会成长为栋梁之才。

我和那些战疫期间的志愿者团队

战疫期间，还有一个群体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就是志愿者群体。

朱华，是影子梦之队车队的队长，他的本职工作是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的一位教师。车队是一群 80 后、90 后集结的志愿者，开着私家车，争分夺秒地为医院、社

区、超市，为火神山、雷神山工地送去最紧缺的防护和生活物资，累计承接运送 115 家爱心企业及人士捐赠物资数万件。封城的 76 天里，他们对接了 184 家医院（科室、卫生服务中心）、200 家社区（养老院、单位）、103 家一线执勤政务机构。为了当这个志愿者，朱老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只能离开家，独自住在工作室里。

周翔，也是我的微信好友，他还是我们大学生文创大赛的评委。他的后象设计师事务所和开在青岛路的鹅社书店相信很多文青都很熟悉，他也加入了一个叫“野路子”的志愿者队伍，充当司机不停地往各大医院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

2012 年我赴德国培训的同学、华科校友罗臻也义无反顾投入了 Wuhan United（武汉爱心同盟）国内物资交付的核心团队，这个由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发起、2 月 4 日才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1 月 31 日交付了封城后的第一批大批量的海外民间捐赠物资。

而和我联系最密切的则是“武汉吖”新能源爱心车队这个民间志愿者组织。3 月初的时候，这个志愿者组织和张燕萍委员、万松委员来给我们社区的困难群众送过蔬菜。后来，汉口北的菜农捐赠蔬菜 5000 斤，我和社区书记带着志愿者去采摘，由于没有货车，就跟这个有新能源厢式货车的志愿者组织联系，他们爽快地派车把菜给我们送到了社区。之后，他们还来给社区的志愿者送过花、给社区做过消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组织的志愿者中，有许多都是各媒体报道过的“网红”志愿者：骆名良，那个在火神山工地打工拿到 7000 元工钱，马上买了牛奶给医务人员补身体的建筑工人；郑能量，那个被誉为“中国正能量”的湖南建工集团的逆行者；魏飞，那个瞒着家人，千里逆行到武汉的退伍军人；胡恒兵，那个酒店倒闭，留在武汉给医务人员免费送餐的小老板……这个志愿者组织从开始给医务人员送餐、转送病人，到后来给养老院送蔬菜水果，最后到东西湖郁金香园采摘鲜花送别援汉医务人员，几乎打满了战疫的全场。

民间志愿者组织，在这次抗击疫情中起到了查缺补漏的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

前几天，江岸区新冠疫情防疫指挥部应急与物资保障组给我发来了感谢信，“武汉吖”爱心车队的创始人给我送来了自制的战疫影集和志愿者纪念徽，社区也给我送来了“情系群众守初心 抗击疫情担使命”的锦旗，这些都是我战疫期间的纪念，很高兴在这个城市需要我的时候，我贡献了一份力量。作为来自企业界的委员，如今我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复工复产，在疫情重创下，企业的日子会比以前要艰难。但是我们坚信，没有冬天不可逾越，没有春天不会来临。我们一定要将抗击疫情的精神带到复工复产中，打好疫情后期的攻坚战。

（郑明：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迪睿道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江白鲟与我们渐行渐远

◇ 危起伟 张先锋 何舜平（口述） 陈 洁（整理）

身体如梭，吻部突出如剑，头部、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呈白色，这条将近4米长的白鲟标本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博物馆里。

对于白鲟，有人悲凉地说：就像北京的世界灭绝动物墓地，苍凉的十字架上，排列着近300年来已经灭绝的各种鸟类和兽类的名单，每一块墓碑都代表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一块块墓碑上，刻写着已经灭绝的各种动物名字和灭绝时间。

2020年1月，白鲟灭绝的消息再次将长江生物保护话题推到人们面前。事实上，不止是白鲟，当下，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无鱼”等级。

危起伟：长江很多鱼都要灭绝了

这个鱼很特别，有一个非常长的鼻子，是在地球淡水鱼里个体长度最长的鱼，最长可达7.5米。“千斤腊子万斤象”，古人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白鲟块头非常大，没有上万斤也是有千斤重的。

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比较稀少的鱼类，本身就不多。由于水利工程、环境污染、滥捕等一些人类活动，切断了白鲟的生殖洄游路线，加快了它灭绝的速度。

白鲟以前生活在四川宜宾的川江一带，跟我国著名的大熊猫是一个故乡，它的生长地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西、湖南，偶

尔也会到湖泊、河口里去吃鱼，所以说，白鲟的繁殖、生长和吃鱼的地方是不同的，需要洄游。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每年可以捕到白鲟 25 吨，到了 80 年代数量慢慢变少了，偶尔可以在葛洲坝捕到几尾至几十尾。1988 年，我国还把白鲟列为一级保护动物，90 年代以后白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最后发现白鲟是在 2003 年的时候，当时只发现了 2 尾。

全世界的鲟鱼有 27 种，中国有 8 种，总的来说，都是处于濒危状态。

2010 年 1 月，我发布论文说白鲟灭绝了，不是官宣，我们联合国外同行以及做模型的观测数据和记录得出的这个观点，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推断和评估。

1984 年底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宜昌第一次见到白鲟，它是死亡的，后来 1985 至 1987 年基本每年都能见到一两尾白鲟的尸体。第一次见到活体是在 1993 年的时候，后来 2002 年、2003 年都见过一尾。2002 年那次很可惜，我们在农业部、长江办的领导下，好多人抢救了那尾白鲟 29 个日日夜夜，从南京运到昆山，最终还是不幸死亡了。

2003 年，宜宾误捕了一尾白鲟，我们尽了全力，当时鱼是救活了，还用超声波标记把它放回长江，进行了 2 天的追踪，但非常不巧的是，晚上追踪的时候船不幸触礁了。当时正值大年三十，船的螺旋桨找不到人修，等大年初二我们修好后回来，这尾鱼就找不到了。后来我们一直在找，我带着队伍找了 8 年，通过农业部的正式批准、三峡科研项目组的支持，用探捕等捕捞方式，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对于长江里的鱼类研究，特别是这些珍稀种类，它们的习性和特点、繁殖和养殖技术，大家都没有掌握，数量也稀少，很难找到研究的样本，而且这些野生的大型鱼类想养活十分不容易。以前的条件不具备，也没有经验，有非常多的遗憾，很可惜。后来我们在研究中华鲟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果现在再发现白鲟，我们相信肯定能将其救活。

白鲟灭绝了，中华鲟、长江鲟今后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其实现在中华鲟也非常少，长江鲟的数量就更稀少了。长江鲟是野生的，从 2000 年开始已经没有繁殖了。中华鲟从 2013 年开始也没有繁殖了，2015 至 2018 年连续三年都没有自然繁殖，所以也是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长江的鱼种类很多，现在处于一个什

陈列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博物馆的白鲟标本

么状况呢？第一，很多鱼已经灭绝了。第二，很多鱼的资源现在也很稀少。2017 至 2019 年，国家农业农村部启动了“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项目”，这个项目把长江划为 20 公里 ×20 公里的网格，通过网格，我们调查了 3 年，发现长江里的鱼类共有三四百种，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没有发现的。现在采样非常困难，这个当中包括白鲟，还有江苏、上海地区人们喜爱吃的鲥鱼，近一二十年也都没有发现，鲸鱼也可能灭绝了，现在卖得很贵的鲂鱼，自然种群也是很少的，以前长江中主要的经济鱼类——圆口铜鱼，在最近的十年也可能处在濒危状态。作为淡水养殖产业支柱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曾是长江里最多的经济鱼类，但如今卵苗发生量已经不足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0%。

水生动物相对于陆生动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应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都在水里，平时看不见，当水质受到影响后，也是不容易察觉的，所以很多人不重视。我们国家的动物保护法分为两块，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陆生动物的种类更多，管理、研究力量也更强大，但并不能说，管的人少了，水生动物就不重要。

像白鲟这种位于食物链高端的鱼类，人工是否能够繁殖？一个要先找到它们，另外我们还要找到它们的生活史并且还原，比如中华鲟，我们相信它在葛洲坝已经找到了新的产卵场，尽管这个产卵场的江段很短，但在三峡每年蓄水前，它还是能够完成繁殖的。

为保护鱼类产卵季节亲鱼繁殖，我国自 2003 年起实施 3 个月的长江春季禁渔期制度，并于 2015 年将禁渔时间延长至 4 个月，并扩大了适用范围。但实践证明，4 个月的禁渔期远不能满足资源保护需要，鱼类在开捕后很短时间内就被捕获一空，资源衰退趋势并未得到遏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出台了更严格的禁渔期制度。2019 年 12 月底，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宣布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全面禁捕；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和通江湖泊等天然水域，最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实行暂定 10 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要想长江恢复生态资源环境，最主要的是“栖息地的修复”，如果长江没有栖息地了，就算不捕捞，有些物种也是不能恢复的。比如中华鲟，当水温达不到它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想办法提高水温或者再找其他类似的地方，像长江荆江段，有一些流入洞庭湖的小河，我们把这些小河进行改造后做成旁道，从而改变水温，恢复成适合它们生活的地方。

从宜昌的松滋口一直到武汉，有长江的新水道，长江勘探设计院做了一个设想和计划，通过缩短荆江航道的九曲回肠，把现有四五百公里的航道缩短到 200 公里，万吨轮船从人工河上走，剩下的河道留给鱼儿们，“鱼船分流”，这在长江大保护中是很好的一个尝试。

张先锋：迁地保护，留住长江江豚的“微笑”可期

对于白鲟灭绝的消息，我很震惊，但不意外。震惊的是，终于有这种说法公开对外发声了；不意外的是，目前白鲟的研究非常有限，在宣布灭绝之前，我们科研工作者是基本不掌握具体的野外数量的，对于白鲟而言，已经十多年没有标本收集和野外观察记

录了，我们没有像其他珍稀动物一样，至少有一部分研究的数据和经验的积累，真的很遗憾。

17 年没有在野外见到白鲟，也没有人工饲养的数据资料，我同意意味着白鲟灭绝的这个说法。

2003 年 1 月，危起伟教授（右二）参与救援长江白鲟

保护长江濒危动物不单纯是一般地保留该动物物种，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所依赖的环境，就是要保护长江母亲河。比如我们近些年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江豚。

我们虽然看到了白鳖豚、白鲟等一些物种的灭绝，但也要看到希望。在二十几年对白鳖豚“淇淇”的人工饲养繁殖和研究中，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吸取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并把一些经验用在了长江江豚的保护上。

2018 年，农业部副部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快速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但其濒危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长江江豚保护的希望是迁地保护。通过生活在几个迁地保护区和保护基地里面的迁地保护，长江江豚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其中湖北石首的长江天鹅洲白鳖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长江江豚 80 余头，天鹅洲的长江江豚保护被认为是世界上首个鲸类动物迁地保护成功的范例。2018 年，对外公开的长江江豚数量已达到 1012 头。

长江保护法的出台是千呼万唤，也是法律界和自然保护界多年努力的结果。前期的调研，在法律文稿讨论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对长江保护法非常关注。我觉得上升到法的高度，对长江的保护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老百姓，既要守法，也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积极投入到长江保护的行列。

何舜平：20 世纪 80 年代亲手参与过白鲟标本的制作

在长江流域，很多鱼类可能正排着队走向灭绝，长江生态系统濒临崩溃并不是骇人听闻。

白鲟这个物种到今天面临着灭绝，其实也说明它确实进化到了末端。一个物种存在的平均时间大概是 800 多万年，从产生到灭绝，从化石的记录来看，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今天这个结果也不奇怪，大家用不着惊慌失措，如果从一百年一千年来看，还有别的物种会灭绝，但是也有新的物种会重生！

我是泸州人，从小在江边长大，那时经常会看到有人拖着比板车还长的白鲟。

1985 年，我从四川到湖北读研究生，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老师说要做几个标本，电话打到三峡鲟鱼所，对方称：“你们来嘛，派两个人拖两条回去就行。”

当时交通不发达，我和现在病毒所何长才一起坐长途车到宜昌再转车到三峡鲟鱼所，冷库里全部都是鲟鱼，我们选了一条 2 米不到的白鲟、一条 4 米多长的中华鲟。当时没有汽车，我们租板车把大鱼拖到长途汽车站，然后花 5 块钱请人抬到客车顶上，坐上晚上 6 点半的夜班车，第二天早上到傅家坡，我们请客车司机把车开到水生所，辗转几天，才把大鱼运到。

等到鱼解冻后，陈宜瑜主任动第一刀把鱼剖开，没有冷冻室，我们就把鱼搬到防空洞里开始解剖。先把肉剔干净，再用砒霜固定外皮，缝起来再填充。

1991 年，我们还在长江口采集到了 100 多条 20 厘米左右的白鲟幼体，后来就逐年慢慢变少了，2002 年在南京找到一条，2003 年在宜宾找到一条，想挽救它们并养活，但都养殖失败了。

说一个东西没有了，不能说没看见就是灭绝了，国际组织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至今也没有官方宣布这个物种灭绝了，这个说法只能代表危教授个人的观点，灭绝这个说法还值得商榷。我是做分类学的，对于我来说，我不能轻易地去说灭绝。

在一本书里，我们的学科组还贡献过一篇有关白鲟的文章，结合古代物种分析其对陆生生物的形成和影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目前有关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已经完成了匙吻鱼全基因组研究。

人类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白鲟在江里是怎么繁殖的，对于研究了几十年的白鲟，我有一些不舍，本来我还想继续研究，但是没有了相关的资料，这个要停下来了。

（危起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张先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白鳖豚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何舜平：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标本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及资源保护中心主任；陈洁：《长江日报》科技记者）

活跃一时的江汉关俱乐部

◇ 李笙清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德、俄、法、日等国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派驻领事，利用贸易特权在汉开洋行、办工厂、设银行，进行经济掠夺。随着汉口开埠通商，江汉关于1862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于中国近代海关实行《海关任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江汉关监督一职虽由汉黄德道郑兰充任，但权力极为有限，只负责税款的保管、直拨、核查及主持地方海关、常关关务、办理对外交涉等，江汉关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均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外籍总税务司，江汉关当家作主的便是英国籍税务司狄妥玛。

江汉关组织机构除了正、副税务司外，按分工不同分内、外两班，内班分大公事房、存票房、税结房、账房、秘书处等，外班有港务长、监察长、监察员、验货员、估验员、稽查员、港务员等，另有负责巡江事务的海事班。因分工不同，内、外班职员之间联系不多，有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武汉，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也影响到江汉关。在外班职员何允庄等人的倡议下，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这也是江汉关最早的华员团体组织。1927年3月13日，位于上海的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随即与之建立联系，翌年12月22日，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派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代表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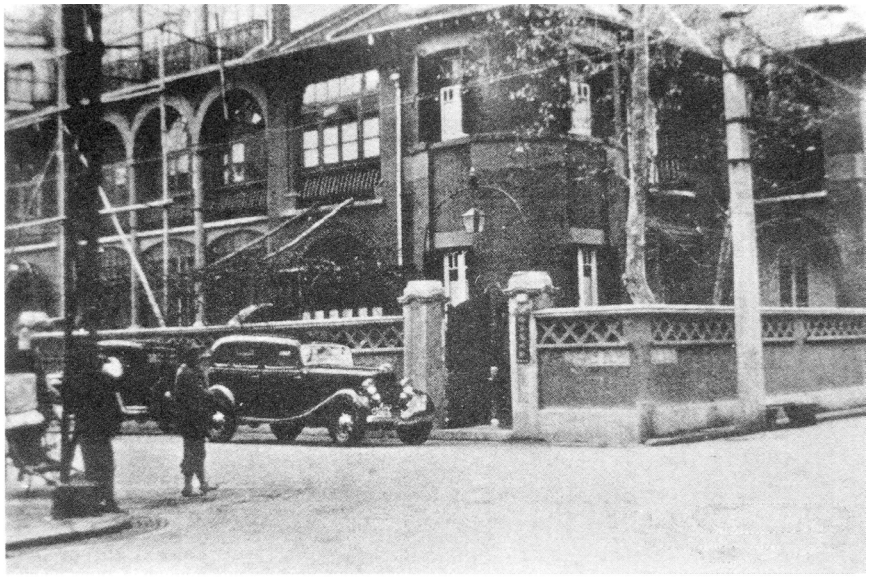
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之初，会员人数不多，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捐的会费支撑，所以规模甚小，但会员积极参与了其后成立的由姚洁担任主席的江汉海关职工总会。1926年12月20日，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江汉海关职工总会发表了《敬告各界宣言书》和《通告全国海关宣言书》，并发出强烈要求收回海关主权的电文，刊载于1927年4月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记载："……慨自海关税权，为外人掳夺，税则由彼协定，实业日益凋敝，财力枯竭，国势衰微，横遭侵凌，无法图强，彼帝国主义之处心积虑，诚酷且毒矣。欲铲除其在华之根本势力，必先与之经济绝交，收回海关管理权，即可破彼经济侵略之阴谋，而制帝国主义之死命，不啻与之血战也……职工等敢告奋勇，为国前驱，否则即当牺牲一切，作政治罢工，直接向彼帝国主义作最后之斗争，除发紧急宣言通告全国吁请援助外，谨此通电江汉关职工总工会陷叩。"电文慷慨激昂，对帝国主义把持海关主权、欺压华人关员的行径进行了痛斥，强烈呼吁立即收回海关主权。

外班华员俱乐部的成立和开展的革命活动，引起洋人统治的海关当局的不满，他们采取了频繁调走会员等各种手段进行破坏瓦解，可海关华员抱团的决心自此一直没有动摇过。在罗达文当选为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执委后，积极发展会员，多方筹措经费，广泛开展活动，如游戏、跳舞、打球等等，俱乐部渐渐有了一些生气。真正要说到江汉关俱乐部的发展壮大，各项活动蓬勃开展，供职于海关总税务司署的中国人丁贵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内班70余人看在眼里好不羡慕，可就是没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鼓与呼。就在这时，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的丁贵堂巡视江汉关，他关于速组华员俱乐部、实现华人关员团结的一席话，让原本死水一团的内班华员很快被鼓动起来，促成江汉关内、外班华员团结一致组成了俱乐部。

丁贵堂毕业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海关官员，对洋人藐视中国主权的跋扈行径深恶痛绝，数次与洋人发生争吵，曾联合在总税务司署供职的华员与洋人据理力争，争得理应享受的房贴、煤贴等正当权益，并参加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对停止招收外国海关职员和实现华洋职员平等作出了一定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汉关俱乐部

丁贵堂走后，江汉关内班华员紧锣密鼓地开始张罗起来，酝酿与外班联合组建江汉关俱乐部的事。内班华员由陈文韬、雷钟炳、谢永钦、王文举、黄国材、杨廉敬等人挑头，与外班的罗达文、柯炳章、郭华骏、韩庭栋、魏发荣、郑铭勋等代表联系，

举行了筹备委员联席会议。经过多次协商，在原有外班华员俱乐部的基础上，终于在1934年4月1日正式成立了江汉关俱乐部，会员除了江汉关内、外班华员，还包括海事部的岳州关同仁。岳州关位于湖南岳阳城陵矶，建立于1899年岁末，隶属长沙关。在江汉关俱乐部成立之前的1930年，因岳州口岸贸易缩减，岳州关撤销，总税务司署命令该关所有事务由江汉关办理，人员早已迁往江汉关办公，城陵矶仅留稽查数人，办理过往船只报关手续，已在江汉关海事部就职的岳州关华员被俱乐部所吸纳。

江汉关华员成立俱乐部，有助于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联络华人职员之间的感情，按理说这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可当时还是外国人当家的中国海关却将之视为慎之又慎的大事。江汉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挂靠于上海海关总部，作为全国海关外班俱乐部总部的一个支部，当然得总部点头才行。于是，江汉关俱乐部筹委会一边发函请示上海总部，一边发出通启，广泛征求在汉外班同仁的意见。当时，外班俱乐部代表提出四项条件：一是联合俱乐部执委外班须占半数；二是外班俱乐部的家具拨给新部使用，所有权仍归外班所有，外班现有会员因之免交入会会费；三是新俱乐部要为外班抄查班准备一间休息室；四是外班旧部址订有两年租约，联合俱乐部要会同解决，如有损失新部须承担经济责任。这四项条件合情合理，所以均为内班代表所接受。

3月23日，海关总署的批准文件抵汉，加上江汉关内、外班华员积极响应，酝酿数月的江汉关俱乐部终于开张，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为宗旨，提出“宣布关税自主，废除国际协定，提高华员地位，打破秘密行政，恢复征收旧制”的响亮口号。经过票选，内班的陈文韬、谢永钦、黄国材、杨廉敬、姚洁，外班的罗达文、柯炳章、郭华骏、韩庭栋、郑铭勋，以及海事部的王华龙等11人当选为执委，大家分工明确，分别担任主席委员、副主席委员、汉文文牍委员、英文文牍委员、会计委员、图书委员、庶务委员等，负责部务管理。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让俱乐部更好地运作，除了规定所有会员按正薪的百分之一缴纳会费外，还由筹备委员会备函，向海关总税务司署请求借款5000元，以解决俱乐部房租、图书及添置设备之用。

俱乐部成立后，寻找到一个固定的场所作为部址，成了执委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物色部址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先是选定商业银行四楼，因租金太高、条件不合而放弃，继而商租汉口河街俄国人的一栋大楼，又因需要4500元的巨额整修费而作罢。接着先后商洽的有英商惠罗公司二三楼、孔医生大楼、统税局大楼、华中饭店盐业银行三楼、理持饭店、烟酒税局大楼、广东银行三楼、凤祥里新楼等处，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几经周折，最后寻得兰陵路47号全楼及45号大厅，才总算解决了部址问题。

1934年11月，江汉关俱乐部新部址租妥，图书室、交际室、弹子球室、乒乓球室、浴室、壁炉及各球场等一应设备配置齐全，于翌年1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江汉关监督席德炳与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郝乐主持典礼并致训词，时任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以及市党部、公安局、邮务工会均派代表出席，中外来宾400余人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俱乐部成立不久，第一场联欢会就于4月24日举行。当天到会男女会员

130余人，除了备有冷食聚餐，还举行了舞会、魔术表演、评剧演唱等多项活动。同年春节，俱乐部又组织了新年同乐会，会员们展示了双簧、评话鼓书、魔术等才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极大地活跃了会员们的业余文娱生活。

俱乐部下设体育、评剧、乐文社等三个组，各组另设组长、文书、会计、庶务等，分工明确。如体育组有会员30多人，组建了足球队、篮球队、网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弹子球队和国术班等，很多会员身兼好几个队的队员。因足球场地需求较大，故足球队借用外场训练、比赛，而篮球、排球、网球等队则借江汉关空地自筑球场训练或比赛，乒乓球、弹子球、国术班亦设在本部内，各队分别由队长负责办理。其中，以江汉关排球队实力最为强大，多次与武昌华中大学、武汉大学等排球队比赛，夺得过湖北省会比赛的冠军，一时驰名江城。弹子球队也有一定实力，多次与本关洋员俱乐部弹子球队进行较量，不分伯仲。

体育组有声有色，评剧组也不含糊。同样拥有30多名会员的评剧组甚为活跃，聘请的胡琴师是有“汉市第一把胡琴”称号的孙陆芝，教演的则是北平富连成科班出身的优秀教师，排演过《落马湖》《捉放曹》《法门寺》《黄鹤楼》《打渔杀家》等数十个剧目。当时，凡是戏剧界来汉演唱者，必先到江汉关俱乐部拜访，如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等，都拜访过江汉关俱乐部，并留赠照片，以示崇敬之意。

江汉关俱乐部乐文社于1936年3月1日成立，社长为陈剑虹，会员都是一些文字功底较好的笔杆子，主要是为《关声》供给稿件。《关声》为上海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总部编辑的刊物，1927年5月26日出版创刊号，发行过季刊、月刊、周刊、半月刊等，亦发行过特刊和增刊，至1949年10月15日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约200期，持续了22年之久，一直是俱乐部和海关华员组织的主要喉舌。它以各种方式揭露旧中国海关当局统治的腐败，报道全国各地海关华员的工作、生活动态，发表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反动统治下海关的黑暗、团结广大华员为求关税自立、华洋待遇平等而进行斗争的文章，深受全国各地海关华员喜爱。江汉关俱乐部乐文社发起人之一的韩庭栋未调来江汉关前，曾在上海主编过《关声》。在他的影响下，内、外班先后有16人参加乐文社，制订简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积极为《关声》撰稿，获得俱乐部总部好评。在1936年10月出版的《关声》上，就一连编发了江汉关俱乐部乐文社郑铭勋、陈剑虹、赵性源、熊大经、刘时叙等人的多篇文章，还编发了赞誉有加的编后语。

江汉关俱乐部应时而生，活跃一时。如抗战时期响应上海外班华员俱乐部总部号召，组织职员捐款，汇总后汇往上海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俱乐部为争取华员权益、消除海关歧视制度据理力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其后收回海关主权、武汉解放前夕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等行动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李笙清：武汉博物馆《武汉文博》编辑部编辑）

武汉历史上有三个王家巷码头

◇ 刘宝生

在整治武汉市水岸线的过程中，倍受关注的当数王家巷码头。王家巷码头有124年或120年之说。124年之说源于厚记轮渡公司开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0年之说源于利记轮渡公司开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而在武汉轮渡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个王家巷码头。

第一个王家巷轮渡码头，即四官殿码头，这是厚记轮渡自开创后使用的码头。码头正对着四官殿上首的王家巷，故称王家巷码头。说到此，江秉诚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江秉诚（1877 ~ 1941年），又名常钧，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家道贫寒，父亲以佃耕和贩卖鱼虾为生。江秉诚为家中长子，6岁入私塾读书，8岁因家境不佳而中途辍学，到乡间一榨坊当学徒，后转而习商。江秉诚勤奋好学，善于经营，博得顾客信任。商行老板争先聘请，后被一熊姓棉花行行主聘用，并与其女结婚。当时沔阳因地势低洼，常年受洪水危害。为了摆脱家乡困境，1892年，15岁的江秉诚只身到汉口投靠其舅王洪盛，当时王洪盛在江夏县同知冯启钧名下当保镖，后升管带（相当于营长），颇有声势。

1896年，冯启钧创办厚记轮渡公司，江秉诚上船当学徒，因善于理财，后升水手、管账、大副和船长等职。1910年，冯启钧被革职，厚记、利记轮渡公司被赵子安兼并，组成安合轮船局。民国初年江秉诚进入安合轮船局，协助王洪盛理事。1921年，安合轮船局的主要成员赵子安病故后，王洪盛升任局长，江秉诚为局长理事，从此，在轮渡业中开始施展管理才能。不久，王洪盛也因年老体衰不能继续经理业务，于是将安合轮船局交给外甥江秉诚接办。

江秉诚为拓展武汉轮渡业务，首次采

用轮渡多装快跑、多开航班的办法，吸引众多乘客过江，致使其他轮渡经营者逐步关门歇业。之后，为保证轮渡安全、方便和准点运行，率先在大王家巷（今四官殿）码头修建码头坡道，设置趸船、票亭，改变以往轮渡沿江打柱靠船、搭跳上下乘客的局面，实行固定码头、固定航线和开收班时间。据民国九年（1920年）《夏口县志》载："有固定地点的轮渡码头，以大王家巷为最早。"这是江秉诚主管轮渡业的一大贡献。

第二个王家巷轮渡码头，即位于大兴二路路口的码头，岸上相对应的是清佳楼。1922年，安合轮船局改组后，所成立的和春公司将原有汉口王家巷码头移至此，便有了第二个王家巷码头。为区别两个王家巷码头，人们便以上下或大小相区别，有人干脆称第二个王家巷码头为清佳楼码头。20世纪70年代，此码头为省航打捞队专用码头。

河街清佳楼系厚记轮渡公司创办人、汉口巡警道冯启钧在河街跨码头而建，宽敞华丽，成本甚巨。1908年，湖广总督陈夔龙与赵尔巽交接之时，冯启钧下令清道，沿街肉鱼、小菜、熟食以及杂货等摊贩，概行撤除，并命人逐段驱逐，激起小贩罢市。人们迁怒于清佳楼，将其拆毁一空，成为一片断椽碎瓦之场，清佳楼作为码头名仍继续沿用。1928年，省建设厅航政处在该码头设小轮查验办事处。

从1933年由湖北建设厅航政处所绘轮渡航运图看，不仅汉口有两个王家巷码头，武昌也有两个汉阳门码头。且武昌的汉阳门码头与汉阳东门码头，相差一字，极易被乘客搞错。有家报纸便以《武汉轮渡码头错杂》为题刊载过一则消息：

"自内河各航线收归建设厅办理后，对于武汉轮渡码头，不免错杂，时使旅客徘徊疎路。记者昨因急事渡江，原拟至汉阳门起坡，讵料坐错了船，由王家巷到汉阳东门，绕一大周，历一小时，始抵武昌平湖门，令人徒呼晦气。深盼航政当局对武汉轮渡码头，应分明标识免误旅客时间，否则饬护航队士，对渡江者，详细指导，亦可稍便渡客云。"

第三个王家巷码头即今之王家巷码头，史称仓汉码头或民权路码头，建成于1933年。说到此码头，必须提到徐源泉。

徐源泉（1886~1960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仓埠镇（今属武汉市新洲区）。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南京陆军讲武堂。1911年秋，闻武昌首义，率学生300余人参加阳夏保卫战，任战时司令部学生队队长。1929年，徐源泉部被调回湖北驻防。此后两三年内，徐源泉在老家仓埠建公馆，同时，在公馆的侧面，原仓埠巡衙署旧址上起屋办仓溪小学，后改为正源学校。

1935年编纂的《私立正源学校三周年纪念特刊》中，除载有学校董事会简章外，还载有校董事会组设轮业管理委员会、工作概要及轮业管理委员会规则。将仓汉轮船局的"仓汉""仓兴"号客轮营业所获纯利为正源学校事业费、补充费，两轮租金为轮船码头补修费。

仓埠地处武湖之滨，早年没有现代交通工具，要去汉口须得绕湖步行，往返城乡一趟很不容易。武湖南通长江，乘船可以直接到达汉口，于是商人、旅客逐渐倾向于水上交通，武湖民船运输日趋兴旺，以致出现"沙口帮"与"黄陂帮"互相竞争的局面。

1915年，由仓埠商人王家崇租赁了一艘轮船，往返于汉口与仓埠之间，几乎垄

断这段水上客运。1921年，仓埠商人卢福田、林子俊各从外地租赁一艘客轮开进武湖。苦心经营几年，挤垮了王家崇，夺得武湖这块水运天地。为避免两家互相倾轧，卢、林双方经两次协商后成立仓汉轮船聚义公司，两轮船营运十分兴旺。

徐源泉荣归故里后，仓汉轮船聚义公司将船租赁给徐源泉经营，遂改名为仓汉轮船局。随后，徐源泉从武汉叶开泰处买下“汉武”号轮，改“汉武”的双车为单车，一分为二，制成两艘客轮，取名“仓兴”“仓汉”号。

《私立正源学校三周年纪念特刊》中刊载有两份文件。《呈租汉口民权路宿列字中间驳岸码头案》写道：“汉口沿江码头以前归湖北建设厅管辖。为行驶汉口至仓埠航线起见，于民国二十一年特由仓汉轮船局经理徐树勋在方前厅长子颖任内呈租民权路宿列字中间驳岸码头。奉批准援照蒲圻同乡会承租秋字码头成例，以半价领租，计每年缴纳租洋一千一百五十元。复于是年经李前厅长书城任内核准注册给照，码头由是确定。”另一份《呈请建筑权路驳岸码头案》写道：“本会为谋旅客便利及航业发展起见，因汉口江岸各码头移归汉口市政府管辖，于二十一年特向市府呈请垫款壹仟伍百元，改建新式石级码头。高与岸齐，宽六公尺。至二十二年二月竣工。行人均称便利，营业益臻巩固。”

从以上两文件可知，1932年12月，仓汉轮船局呈拟在“宿”“列”两码头中间，即民权路口添建码头一座。汉口市政府派员勘测，认为可行，批令预缴租金，于1933年修筑完成宽6米的码头。

《汉口市政概要》“工务”章节中以《仓汉码头》为题叙述此事：“本府自修筑沿江马路后，同时将江汉关以上至打扣巷一带，修筑大小码头二十一座，编列字号，分为公开与租、赁二种，拟定管理规则公布施行在案。二十一年十二月，据仓汉轮船公司经理徐树勋呈拟在宿列两码头中间（即民权路口）添建码头一座，经本府派员勘测，认为可行，批令预缴租金，计划修筑。计码头宽六公尺，伸出堤岸线外二十一公尺，高九、七五公尺，麻石踏步共六十五级。于二月开工，五月完成。”即今天的王家巷轮渡码头。

前几年，市政府出资对王家巷码头进行现代化改造。参照武汉关和中华路轮渡码头，建有现代化栈桥，使得坡道平缓方便行人和电动车、自行车上下船。

至于何时何人何以将原来的王家巷码头之名移给民权路码头，而原来的王家巷码头又冠上四官殿码头之名？有待进一步查阅史料。

（刘宝生：武汉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武汉公交集团退休职工）

清末武汉驿站漫谈

◇ 苏 醒

驿站是我国古时传递公文的人及过往官员、使臣和客商歇宿的处所，是传统的官办旅馆，为过往官员、驿吏、商旅者旅行提供了方便。清代置驿，“均发轫于京师之皇华驿，在内地各省均称驿。”驿站的发展伴随着清代从清初经济的残破到三朝的繁荣，至清末衰败的状况而起伏变化。

清末，有 6 条全国重要的官路经过武汉地区，分别是桂林官路、秦岭大路、汉中大路、长江路、云南官路、广东官路。其中，桂林官路是自北京南下，从平靖关入鄂，入江夏，由鲁家巷转流芳岭，经纸坊、山坡、贺胜桥，入咸宁，通往湖南、桂林；秦岭大路是由汉口经云梦、襄阳、河南淅川到西安；汉中大路是由汉口经宜都、山西安康到汉中；长江路是自成都经宜昌，从汉口出浠水，经安庆到南京；云南官路是由武昌经江陵通往云南；广东官路是由武昌通往江西、广东。武汉地区驿道成网，是马递、水驿、步传相结合的全国邮传网络中心之一。沿途均设有驿站和递铺，“视道路之远近衢僻，适中设之”，通常 60 里设一驿，10~25 里设一递铺。陆驿配有马匹、马夫和兽医；水驿则配有水驿船和水手；步传设有铺司、铺兵。驿站经费全由田赋内开支。

从《清代江夏县驿道铺路图》可见，江夏县境内有 5 条驿道线路共计 154 公里，以江夏县将台驿为起点向各府、州、县辐射，东面方向，经土桥站、华客站，经黄冈县通安徽；南面方向，一路为水驿，经夏口、金口，抵湖南，一路为陆驿，由鲁家巷转流芳岭，经纸坊、土地堂、山坡到贺胜桥，进入咸宁通往湖南；西面方向，渡江经汉阳县，经汉川县至湖南；北面方向，渡江经汉阳县驿、滠口驿、双庙驿，经孝感县通河南。设有 5 个驿站，分别是将台驿、东湖驿（县南 60 里）、山坡驿（县东南 120 里）、土桥驿（县东 60 里）和金口水驿（县南 60 里）。其中，

将台驿位于今天武昌区大东门一带，东湖驿在今五里界乡东湖街村，土桥驿在今洪山区魏王村。

江夏县共有21铺，铺司10名，铺兵132名，总长155公里，4条铺递线路：往东，有将台铺、冷水铺、长山铺、土桥铺、山口铺、新桥铺，与武昌县交界；西至汉阳总铺；往南，有长虹桥铺、和尚桥铺、新管铺、石子岭铺、纸坊铺、狮子桥铺、龙泉铺、新市铺、聚仙铺、诚信铺、潘杲铺、桃林铺，与咸宁县交界；往北，有孟城铺、横山铺、青山铺、官屯铺、阳逻铺，与黄冈县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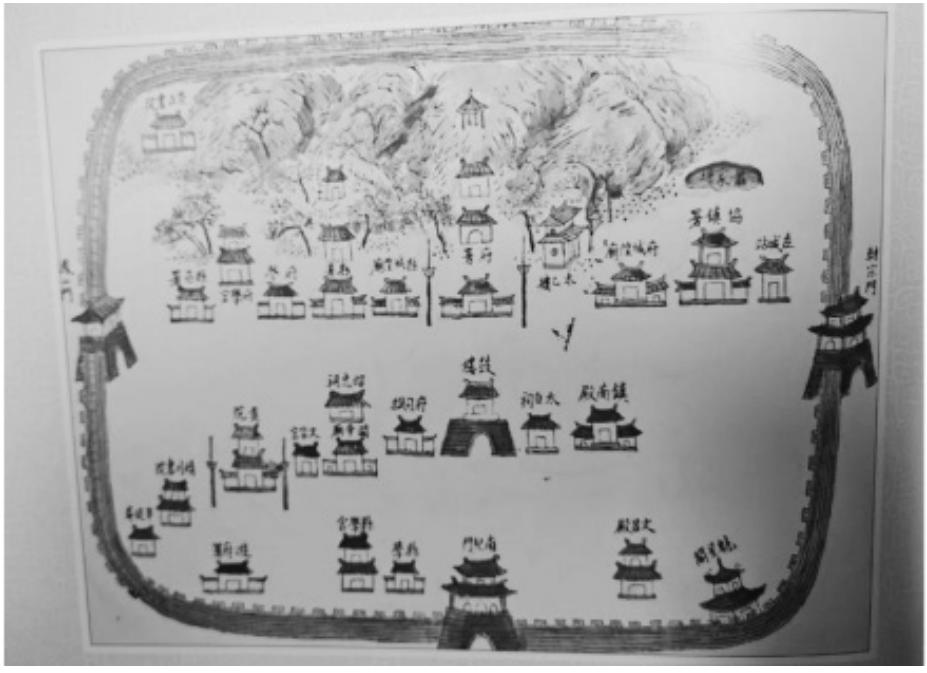
清代江夏县驿道铺路图

隔江相望的汉阳县，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始辟驿道，至同治八年（1869年）境内辟有水路驿道4条，即以汉阳城为中心，东至江夏县水驿十里；北经汉口镇至黄陂县驿道80里；西经蔡店至汉川马口驿道110里；南经沌口、黄陵矶、新滩口至嘉鱼县城240里，境内190里。据光绪《汉阳县志营建略》载：“驿二，在城驿，在朝宗门内，东达江夏县将台驿，北达黄陂县滠口驿，西达蔡店驿。今额排夫一百一十名，马夫十名，马匹十匹。蔡店驿，在蔡店镇，东达在城驿，西达汉川县城驿。今额排夫十名，马夫二十名，马匹四十匹。”如清同治七年（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之“汉阳县域图”所示，清光绪时汉阳县共设驿馆2个，一个是在城驿（在城站），在汉阳县朝宗门内，系马驿；一个是蔡店驿，在汉阳县西60里，系明正德初年，由汉阳知府蔡钦以蒲潭水驿奏改为马驿。汉阳县境内设铺10个，铺司10个，铺兵41名。总铺，附设在城驿内，向东10里达江夏县总铺；向西10里至十里铺，15里至孟家铺，10里至新店铺，10里至黄连铺，10里至陆神铺，10里至高观铺，10里至幺铺，10里至蔡甸铺（附蔡店驿内），15里至崔家铺，10里达汉川养鱼铺；向北40里达黄陂滠口铺。汉阳至今还保留有十里铺的地名，也是历史的印证与延续。

将台驿原址本在武昌城东大道以北，明末清初时，周围都是菜地，四面无邻，人迹罕至，时常有盗贼光顾，连驿吏都不敢住在里头，更不谈旅途中的人了，因而任其荒芜，形同虚设。洛阳人张公赴湖北任太守后，看到驿址颓圮，恰逢那一年又涨大水，将台驿的几间房子全部被水淹没，于是将其迁至宾阳门外，准备重建。新修后的将台驿，面貌焕然一新。前为门楼，二为仪门，三为大堂，高二丈，宽四尺，左右翼各三间，后堂三间，与前堂一样，屋宇高耸，庭院宽阔，气宇轩昂。左为马祖祠，右为土神祠，各有翼室。还有监房三间。作为省府之区，輶轩之使，击毂摩肩，经过此地，多宿于此，将台驿一时兴盛繁荣起来。清末，将

台驿成为统领湖北全省驿站，为马递、船送、人传的官方邮驿，成为当时江夏县最大的驿站，《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载：“仅此一驿就设马 90 匹，配备各种船只 64 只，所设水手、排夫、兽医等人近千人。”

在清朝使臣王昶的《雪鸿再录》《使楚丛谈》两篇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在山坡驿和东湖驿的见闻。《雪鸿再录》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八月）初二日【略】日卓午饭毕，由田畔行，道路崎岖诘曲如前，每逢险处，辄下步行。三更抵山坡驿，杳无候人，自买新米，炊事而宿，云是江夏界也。初三日，晴。行十余里，坐小舟荡桨，过金丝桥。远岫平湖，风景澹沱，可谓胜地。六十里抵东湖驿，驿舍颇整，馆人供馔唯谨。初四日，换船下东湖。时沿江两岸村庄淹没，渺漫无际。午刻抵武昌。初五日，以汉口淹没，无雇马骡处，遣人往社（滠）口雇之。社（滠）口距城四十里，实黄陂境也。初七日，仍住，未能成行也。初八日，社（滠）口信来，云五六日间贡使及姜抚军暨舒制军家眷络绎启行，雇驿马以数百计，故至是始得骡纲。初九日行。武昌江面本八九里，今宽至五十里，望汉口更浩淼也。酉刻抵社（滠）口馆宿。”文中可见，当时进入江夏县的驿道路况并不是很好，都是田野小道，道路崎岖，时常要下车步行。王昶抵达山坡驿时，驿中已无人服务，只能自己购米做饭，安置住宿，说明当时山坡驿食宿服务设施尚存，但是驿站管理人员不知踪迹了。到了东湖驿，“驿舍颇整，馆人供馔唯谨”，食宿配套条件大为改善。文中没有交代王昶在武昌的食宿地点，但从其行程轨迹判断，其应是在武昌将台驿止宿，且因汉口发大水，在武昌住宿了五日。直到得到黄陂县社（滠）口驿的骡马援助后，一行才乘驿马离开武昌抵达社（滠）口馆（即滠口驿），行程有曲折但总体仍较为顺利。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王昶再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去湖南查办案件途经山坡驿、东湖驿时，驿站的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令其感叹不已，如其日记《使楚丛谈》中记载：“八月二十三日，行六十里至东湖，及驿已击柝矣，驿中马匹俱无。八月二十四日，七十里至山坡驿。驿务荒废，与前数站同。”东湖驿人走马空，无人看守，山坡驿业务荒废，驿站呈现一片颓败之势。



清同治七年（1868 年）《续辑汉阳县志》之“汉阳县域图”

除上述的驿站

之外，在清末武昌城南的磨盘巷（平湖门附近），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被张之洞修建成为一个高端的驿馆，这就是“胡文忠公祠”。胡文忠即张之洞的恩师胡林翼，湖北巡抚，因病逝于武昌，卒谥文忠，“湖北奉旨作庙黄鹤楼之侧”，“成立专祠以祀”，即胡文忠公祠，这里曾是武昌城南一大景观。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在督建铁厂之余，专门到胡文忠公祠拜谒，但当他到了现场，“‘胡文忠公祠’的竖匾，油漆斑驳，蛛网四结，两边楹柱依稀可辨当年曾国藩赠给胡林翼的联语：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院子正中是一座虽不高但占地也还宽阔的青瓦青砖木柱木梁的厅堂。一边有四五间低矮的小平房。院子里杂草丛生，几只母鸡在到处觅食。”张之洞感慨，仅仅过了二十年，当初极为风光的祠堂透露出浓厚的衰败之气，他极为伤神，默默祷告“务必重修祠堂，改换旧貌”。同行桑治平此时建议比照京师贤良寺，将胡文忠公祠扩大两倍改造成高档驿馆，使其成为“联络生息、秘密会谈、安置绝密人物”的政治场所，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并着手将其打造成了“武昌城里最好最安全的驿馆”。不久之后，慈禧太后的亲信吴永来湖广办粮饷时，张之洞视之为“不平凡的客人”，由梁鼎芬陪同，将其安置在胡文忠公祠，“并从两湖书院抽调两名略知文墨的仆人来专门服侍他。”此时，胡文忠公祠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驿馆，已成为了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政治交际场所。

据 1884 年 9 月 27 日《申报》记载，胡文忠公祠还经历过一次火灾。1884 年农历八月初四，鄂垣北风劲疾，江上雪浪如山。晚 7 点半钟时，汉阳门外街东门坡地方张姓骨董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遂致燎原，一时箕伯扬威、祝融肆虐。城内黄鹤楼第二层护栏亦被延及，立兆焚如；附近黄鹤楼之官厅与涌泉台厅顶，同付一炬；沿江一带木作板面、住宅，共焚去二百家左右。至晚 11 点钟，火势延至平湖门边，始行止息。最神奇的是，胡文忠公祠近在旁侧，却幸免于火灾，包括其旁之祖师殿、鲁班阁，俱赖以并存。随着城市的变革发展，胡文忠公祠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已难有遗迹可考。

1912 年 5 月 30 日，北洋政府交通部长施肇基呈大总统文中称：“湖北省于民国元年十一月抄送邮寄章程内称，驿站早经裁撤。”武汉地区的驿站在 1912 年 11 月宣告结束。

（苏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2016 级博士研究生，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副主任）

略谈老汉口的“杂耍地”

◇ 张 垠

在老汉口，杂耍所包括的项目很广，举凡说书、相声、戏曲、武术、杂技等，皆列其中，应属文化娱乐业范畴。杂耍的主角为民间艺人，其场地简陋，一块路边空地即可，可谓表演方便，成本低廉。由于当年汉口市民的文化娱乐极度匮乏，“杂耍地”的出现，填补了这方面空白，故很受市民欢迎。然如今的研究者却对此少有关注，即便是研究汉口文化娱乐业的专著，对曾经的“杂耍”也是避而不谈。鉴于此，我收集了有关资料并草拟成文，仅供参考。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汉口最繁华的地方当属六渡桥，六渡桥最热闹的地方是肖家院。可在 1877 年时，肖家院还是一片荒地，后面为湖淌，仅有一简陋的肖氏善堂，“棺木暂厝其间”。其后有人开始着手用土渣填塞肖家院水淌，零星地建了几栋房后，便形成空地，被民间艺人占为“杂耍地”。

该“杂耍地”的过往，是我市门牌收藏家吴正祥最初告诉我的。其父吴方年生于 1924 年，14 岁即走街串巷“摇金货”，他曾说肖家院的这片空地是往日汉口的“天桥”，听说书、看杂耍，人声鼎沸。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由“汉口海云垒画馆”于清光绪二年（1876 年）刊印的《湖北武汉全图》，其正下方画有肖家院，能看到有人在那里“打围卖艺”，门口有人收费。该图画风写实，如晴川阁、钟台书院等建筑，与老照片上的影像相似度甚高。

1950 年的《戏剧新报》也印证了吴先生的说法：“二十多年前六渡桥有一块大空

敞地，和北京天桥一样，有许多小玩意如：‘把戏’‘武术’‘说书’‘大鼓’‘小曲’等等，也有‘汉戏’‘道情’‘猴把戏’‘被卧戏’（即木人戏）‘双簧’‘西洋片’各种民间艺术，每天的观众平均总在一千人上下，有时观众也来参加客串，可以说是工农大众们的一个大乐园。”

刊印于清光绪二年（1876 年）的《湖北武汉全图》

如果说上述资料概述了肖家院“杂耍”种类的话，日本人内田佐和吉在 1944 年出版的《武汉巷史》则详述其表演及经营形式：“在帐篷里摆上六七条长凳，客人们在这里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听书。说书的内容大多是《水浒传》《三国志》等，帐篷里一般都有两个人，一人说书，另一人在适当的时候向坐在凳子上的客人收铜钱，拿出两枚铜钱，可以坐在那里慢慢地听上半天，除说书的之外，玩杂技的也很有人气，一年四季都能吸引客人。”

据称，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蛮多“杂巴什”。一是有吃的，各种汉味小吃，瓜子花生之类，好吃不贵；二是有玩的，打气枪、丢圈子、看西洋镜等，既新又洋；三是有买的，红头绳、蛤蜊油、小镜子等，价廉实用。

由此可见，当年的肖家院犹如大众娱乐圈，说书、杂技、大鼓和小曲等品种丰富，消费价格低廉，且具有参与性。每日吸引上千人，一年之中无淡季，难怪吴先生的父亲挑着担子去赶场，因为这儿人多生意好呀！

老汉口最早的“杂耍地”当属后湖。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其故道逐渐淤涸，形成众多湖泊，老汉口人将其称为后湖地区。1822 年刊印的《汉口丛谈》称后湖：“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春时丛树扶疏，芳草鲜美，覆云在地，流霭接天”，“接管纷喧，百鸟鸣笼”，说明清代嘉庆年间后湖已成为天然公园，是市民休闲游乐的处所。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对这里的“杂耍地”如此描述：

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
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

这首诗描写了梁山调、木偶戏、道情和变戏法 4 种表演形式。据了解，清道光年间，各地民间艺人竞相来到后湖，形成了多品种和规模化的表演，其表演形式远不止这 4 种，所以叶调元还有诗道：

近日耍戏更新鲜，教法能将畜类传。
猴子狗熊玩棍棒，雀儿老鼠打秋千。

魏予珍的竹枝词则记录了后湖艺人的辛酸与窘迫：

落拓江湖唱楚声，此中应有不平鸣。
曲终锣底无声息，难饱饥肠一日温。

江湖艺人卖唱时，先用胡琴锣声吸引听众，待围起人圈后，开始卖唱，“楚声”即为汉剧或黄孝花鼓戏。一曲唱罢，艺人即将铜锣翻转过来，请听众投钱，但所获甚少，唱了半天仍不得果腹。

枯水季节的江滩也是汉口早期的“杂耍地”。我见到过汉口出版发行商 1900 年印行的两张明信片，一幅为冬季枯水季节时，百余人在江滩上围成一个大圈，围观杂耍表演。有趣的是，人圈外摆着一溜水桶。可见有些人原本是来江边打水，被杂耍吸引，成为了观众。另一幅为一名艺人正在表演口中吐火节目，背后是密密麻麻的观众及桅杆，还有架子鼓为表演伴奏，可见其表演形式已趋成熟。明信片印制年代表明，18 世纪中后叶（我认为可能更早），汉口已有较成熟的杂耍表演。

汉口另一个著名的“杂耍地”，位于江汉路与循礼门货站之间的一块空地。20 世纪初，搬运工人为在货场扛活有个歇脚地方，就在这里搭建简易的草棚，老汉口人称为“鸭娃棚”。彭华翔先生收集的当年歌谣道：“鸭娃棚，三尺高，爬出爬进要弯腰。”（见《武汉童谣纵横谈》）渐渐地，这里人多了起来，挑担的、缝衣的、说书的、唱戏的、玩打的、卖药的等等各种营生杂耍，纷至沓来，成为又一个汉口的“天桥”。1916 年，这里建起了著名的“老圃大游戏场”。

硚口也有影响较大的“杂耍地”，其东至崇仁路，西临硚口路。每天开场时间为傍晚 6 点至零点，评书相声、大鼓小曲、武打西洋镜等等，应有尽有；还有穷孩子在这里提篮卖瓜子和梨膏糖。与肖家院相比，这里消费更低。你若不坐演艺方提供的条凳，站着听书或看西洋镜，可不用花一分钱。

这里既有过路的江湖客，也有如杨四知堂等长期坐庄的老把式。诸多武师中，张金亮的“滚趟双刀”令人称绝；“评书大王”夏秀峰说的《施公洞庭传》，让人欲罢不能。那时，这些评书等街头艺人的收入不高，据 1930 年汉口市对 64 名评书艺人的调查，月收入最高者 40 元，最低者仅 10 多元，平均收入 24.53 元，低于同期人力车夫 25~30 元的平均月收入。1938 年 10 月底，日军侵占汉口，将这里建为军营。

1900 年汉口出版发行的明信片，内容为冬季枯水季节在汉口河滩围观杂耍艺人表演的人群

民国时期，汉口有名的“杂耍地”还有不少，比如万松园、集家嘴和四官殿火场等，都曾是民间艺人展示技艺的场地。

汉口开埠以后，其周边农村破产农民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大量涌入汉口谋生，其中尤以黄陂、孝感人居多。农村移民的文化素质构成使汉口城市文明中过多地保存了乡村文化娱乐的风俗，使得清末民初汉口的大众娱乐业向着“俚俗化”的方向发展，“杂耍地”的兴盛，即为证明。涂文学先生曾在《汉口近代文化生成机制探源》中指出：“近代的汉口，在街头巷尾之中，瓦肆勾栏之间，设场买唱地方小戏，摆摊围圈耍弄民间武术杂技十分活跃，构成一幅低吟浅唱、百态纷陈的繁华而杂乱的市井文化画卷。”

从 1929 年起，汉口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三民路等道路，这些道路两侧便新建和扩建门面住宅，从而使有闲阶层的居住地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从堤内（以长堤街为界）迁至堤外，很多空地被用于建房，民间艺人的“杂耍地”逐渐被市民住宅挤占。无奈之下，汉口的民间艺人们将卖艺地点迁至大智门火车站和老大智门之间的一方空地上，最多时在此支起了 40 多顶帐篷，而帐篷里则是各种卖艺表演。然而不久后，这一带也开始建房，艺人们只得又转向更偏远的华景街后面的地带。

城市的演变令民间艺人猝不及防，他们的活动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且找不出有效的应对方式。一些知名的民间艺人渐渐落伍，不适合市民的口味。市民娱乐兴趣开始转移到电影和戏剧上来，由于汉口的外来者以黄孝人居多，所以由黄孝花鼓戏演变的楚剧很受市民青睐。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大部分民间艺人已失去演艺场地，其生活难以为继，只得另谋职业为生。

从此，那些曾经喧闹的“杂耍地”逐渐消失，一座座新的剧场影院应运而生。楚剧、汉剧和电影取代了“杂耍”，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由马路进入了剧场影院。

据戏剧史家研究，中国古代剧场经历了流动型（原始性撂地为场，即“杂耍地”）——广场型（露台、舞亭、乐楼、戏棚、山棚）——厅堂型（宴乐、堂会）——剧场型（乐棚、勾栏、戏园）四种基本形制，“杂耍地”乃其原始形态，是研究话本小说、相声、戏曲和杂技等文娱种类诞生或起源的重要依据。

（张垠：武汉市江汉区园林局干部）

征稿启事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全国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付出了很大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湖北和武汉是重中之重，更是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全国各地的逆行者驰援武汉，社会各界人士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我市各级政协委员也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了学习先进楷模，弘扬抗疫精神，凝聚强大力量，激励全市人民向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奋力迈进，《武汉文史资料》拟编辑出版纪念专刊。

一、征稿对象

市、区政协委员，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二、征稿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护救治的感人场面、封控值守的抗疫故事、建言献策的履职情怀、物资捐赠的爱心接力、社区帮扶的暖心时刻、邻里互助的真情瞬间。

三、截稿时间

2020年9月30日。

四、文稿要求

1. 稿件应充分体现政协文史资料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以第一人称叙述，由当事人撰写或当事人口述，他人整理；

2. 内容客观真实，突出事件细节，文风朴实生动；

3. 文稿篇幅3~5千字为宜，并配有抗疫相关照片及文字说明；

4. 来稿请对撰写者或口述者作简单介绍，并附撰写者、口述者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等。

稿件电子版请发送至本刊邮箱：whzxwszl@163.com，纸质稿件请邮寄：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联 系 人：张川蕾 游 迎

联系电话：82220669

本刊编辑部